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大綱口試本）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Proposal

權力轉移理論下之戰略三角類型變化

The developments of Strategic Triangle under Power Transition

學生姓名：林佑樺

Lin, You-hua

指導教授：包宗和博士

Bau, Tzong-ho, Ph.D.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Mar., 2014

目　次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文獻回顧.....3

壹、關於權力轉移理論.....3

貳、戰略三角理論.....9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17

壹、研究途徑.....17

貳、研究方法.....17

第四節 預期成果與研究限制.....19

壹、權力轉移期間之戰略三角可能類型變化.....19

貳、權力轉移理論下戰略三角類型變化走勢與戰略三角理論之分析.....30

參、研究限制.....42

第五節 章節安排與研究架構.....45

壹、章節安排.....45

貳、研究架構.....46

第六節 參考文獻.....47

壹、中文部分.....47

貳、外文部分.....52

圖表目次

圖 2-1　國際權力金字塔與滿意程度.....7

圖 2-2　Dittmer, Lowell 的戰略三角類型.....11

圖 2-3　各類型戰略三角與角色.....12

圖 2-4　量化定位下的各類型戰略三角角色得分.....14

圖 2-5　孤雛地位者提升角色走向及三角類型變化.....15

圖 4-1　權力轉移理論下之三方互動階段.....21

圖 4-2　權力轉移下之戰略三角類型變化走勢.....30

圖 4-3　權力轉移下之戰略三角變化之各方角色得分.....31

圖 4-4　孤雛地位者提升角色走向及三角類型變化.....31

圖 5-1 研究架構圖.....46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旨在就戰略三角理論提出較差地位者提升角色的路徑，以及最穩定的三角類型，若加入國家權力差異因素時，特別是支配國（Dominant nation）、挑戰國（Challenger）與相對小國所構築的戰略三角，在大國的權力轉移過程中，戰略三角的變化走勢，分析是否推翻戰略三角理論的路徑圖，抑或賦予戰略三角理論更豐富的內涵。

國家的目標眾多，主要仍是追求國家整體利益的極大化或損失最小，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認為，國際權力分配與運作是一個層級體系（hierarchical system），所有國家都存在其中，支配性霸權（Dominant power）結合滿意現狀的各種大小國家，建構出同盟合作關係（alliances），有助於強化體系（system）的穩定，例如美國與西歐國家創始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Tammen,2000: 33）。面對國際社會大小不等國力的國家，如何運用己國權力影響他國政策，以獲取己國利益，將視國際權力分配及國家領導人對現況的滿意度而有不同。

戰略三角理論（Strategic Triangle Theory）則描述三個具戰略意義的行為體，其互動關係的好壞，決定戰略三角類型以及己國在三角中的地位得分，歷年研究相關主題除了增加量化定位並推導行為者角色地位提升路徑與理想中的均衡三角類型外，多為實證研究，以國際社會中的三個國家為例子，檢視一段歷史期間的關鍵事件，如何影響三方關係的戰略三角類型演變。

然而，戰略三角理論並未觸及行為者的國力強弱，如何影響三角類型變化的領域，而權力轉移理論雖具體論述支配國集團與挑戰國集團衝突的可能性，但該理論焦點集中於兩大強權勢力的對決，卻忽略兩大勢力之間，若存在著一個對雙方陣營均具有共同戰略利益、國力相對而言較弱的自主第三方，其政策態度，將如何左右此三個行為體的兩兩互動，尤其當支配國面臨挑戰國的國力逼近時，第三方行為者如何決定與兩大勢力關係的好壞，以獲取己國長期利益。因此，筆者

認為將權力轉移因素納入戰略三角研究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著重於理論推導，以 Organski（1958）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為基礎，探討國際體系中三個實力不等的行為體，可能的三角互動類型，此三角類型的走向，與戰略三角理論中，較差地位提升角色走向的變化及均衡三角的比較（包宗和，1999）。研究的時間範圍，從建立國際秩序的支配國之權力發展階段劃分，選擇支配國之權力成熟期階段，再進行細分為崛起國剛開始工業化、工業化急速推展中與中後期實力逼近支配國的三個期間，做為時間研究範圍。

在研究範圍的空間方面，較早工業化發展實力，且具備成為強國條件的大國，因工業化帶來的優勢，成為國際權力分配運作秩序的支配者。其二為具備成為大國的天然及社會條件，因快速工業化而提高實力，逐漸縮小與支配國的實力差距，甚至近逼支配國，成為國際權力的挑戰國，不滿於國際權力分配的現況，為追求國家目標的實現，要求更多權力優勢以獲取更多國家利益，但不探討其係為推翻現制重新建立秩序，或取代現有領導國接收現制。第三方為三者中滿意權力分配現狀的相對中小型國家，因為不具備天然條件與社會因素成為大國，故即使完全工業化，仍為相對國力較小的國家，從現行國際體系中獲取利益，滿意現行國際秩序的運作，無意也無力改變現狀（Organski,1958）但其對外政策對兩大強權均具有重要意義，藉由兩兩雙邊關係的經營，牽動戰略三角中的地位變化。

在上述時間研究範圍的三個期間中，每個期間因著權力的相對消長，三方互動產生友好或敵對的關係變化，推導可能產生的戰略三角類型走勢，並與戰略三角個體論與總體論（包宗和，1999）提出之角色提位提升以及均衡模式交叉比對，歸結出受權力轉移影響的三方行為者，相互互動所形成之戰略三角變化，如何回應戰略三角理論，本研究以理論推導及比較為主，至於國際體系的實例檢證，留待後學先進繼續研究擴充。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為探究戰略三角類型，在加入霸權因素及相對國際權力的成長與轉移，可能對原戰略三角理論中，各行為者提升角色地位路徑之影響，因此，回顧權力轉移理論與戰略三角理論的內涵及其發展，深具必要性。權力轉移理論主要跟隨 Organski 提出的模式，而戰略三角理論則依據 Dittmer 所提出的內容，繼續由古今中外學者提出論述探討並實證理論，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的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壹、關於權力轉移理論

Organski（1958）被視為權力轉移理論的始祖，於 1958 年提出以「國家」為行為的主體，必須依序瞭解國家目標何在，什麼因素決定國家的目標選擇，嗣探討國家權力的本質，以及成就權力的天然因素與社會因素，在瞭解國家目標與權力形成後，分析國家如何運用權力從國際體系獲取國家利益，以權力轉移三個階段說明權力的成長與轉移，將牽動國際秩序與和平的現狀。

一、國家目標與權力本質

依 Organski（1958:51-77, 93-218）指出，國家目標意指多數人民共享並堅定認為重要的目標，由政府行動，直接影響其他國家人民，國家的目標主要為四大類：權力、財富、文化與和平。這四個目標彼此相關，具連動關係。權力，是達到其他目標的重要工具，當一個國家位居國際權力體系特定地位，代表此國相對於其他國家擁有特定程度的權力；財富，以工業化增加生產力來累積財富，以增加國際行為的影響力，即成為國力的來源；文化，保存生活文化以凝聚人民向心力，並以文化做為榮譽的象徵，以統一國家、增加國力。和平，有時是達成其他目標的前提要件，也可能是達成其他目標的阻礙，尤其是挑戰國想改變現狀，而

支配國不願和平讓與時。但戰爭會傷害權力與財富，因此，沒有任一國家會不計代價的追求和平。

一個國家追求這些目標時，可能視之為絕對目標或相對目標，差別在於是否與其他國家比較，若持續關注其他國家在某個目標上是否趕上自己，就屬競爭性目標。國家目標的種類，也可分為長期目標或短期目標，以短期目標逐步實現長期目標。

而國家的權力，係指國家影響其他國家行為的能力（Organski, 1958: 95），財富、資源、人力和武器科技若運用得宜，均能帶給國家更多權力，但權力不是靜態不動，在國際關係中是此消彼長的，有權力的國家可以選擇適時運用，而不同時全部運用。

國際關係中運用權力的方式，亦即指己國使他國做己國想要他國做的，方式包括說服、獎賞、處罰與武力，至於採用何種方式影響對方，須視兩國關係的滿意程度，或國家的目標而定。首先，訴諸歷史情感等方式帶出他國忽略的事實，或指出未來可能遇到的利益與不利益，以說服他國改變政策。其次，提供物質獎勵，也是吸引他國選擇對己國偏好的行動的方式，例如技術協助、經濟與政治上的支持，甚至只是沈默不作為，都是獎賞的型式。第三，若他國堅持做己國排斥的行動，己國可事先警告威脅可能的懲罰。最後，若預告威脅懲罰仍無法影響他國的決策，兩國關係陷入極廣泛的歧見，己國最強烈的手段將訴諸武力，直接使他國別無選擇，但戰爭代價不斐，任何國家都不會輕易真正開戰。

決定國家權力大小的因素，包括天然的與社會的，前者包括地理條件、天然資源、人口；後者係指經濟發展、政治結構與人民情感。領土廣闊、氣候宜人，重要的地理位置、天然資源豐富且具開採使用的技術、人民生產力高、消費能力強大等天然因素，均對國力有貢獻。而高度的經濟發展，有助於國家使用權力以說服、獎勵、懲罰或開戰；決定國家目標，以及選擇如何在國際間運用權力，以影響他國，均仰賴政府結構與政黨體制，決定外交政策、議程設定及對經濟的控

制等政策；至於人民願意為促進國家福祉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程度，或稱愛國主義，亦決定國力強弱，因此，強化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度很重要。

綜合衡量權力因子之間的關係評估國力，透過補強不足之處，以增加國力，將對邁向權力頂峰之路極有幫助。

二、權力轉移

Organski（1958:299-338）認為國際政治的權力分配不會自動均衡，權力的主要決定因素在於人口、政治效率與工業化程度，權力分配的轉移也是如此。現今國際秩序的不穩定，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人口、政治組織及工業力量快速變遷的時期（period），一個國家也許還在國際體系金字塔的底部，近年國力卻快速上升。新來者持續挑戰國際政治建立者的領導地位，若任一個挑戰者挑戰成功，表示將有權力的巨大轉移，從一個國際體系到另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但不論誰暫時贏了，都將面對未來的新挑戰者。

重大的變遷影響國力，以工業化而言，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同時在財富、工業力量、人口、政府效率等方面成長，而這些都是國家權力的主要決定因素，增加他們等於增加國家權力，雖然國家的基礎左右了國力增長的程度，但的確都帶來國力的提高。一個國家的國力從弱小到強盛，分成三個階段（Organski, 1958: 300-338）：潛在權力期（The stage of potential power）、權力成長期（The stage of transitional growth in power）與權力成熟期（The stage of power maturity）。

處於潛在權力期的國家屬農業社會，尚未工業化，生產力低落，國家力量相當穩定但穩定度極低，即使在非工業化國家中是強大的，國力都難以相比一個最小的工業化國家。若國家由尚未工業化進入工業化，即進入權力成長期，國力快速增加，迅速追趕先進的工業國家，國家內部產生根本性改變，生產力上升，國民生產毛額急劇成長，生活水準改善，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也下降，國家整體的人生生活都有徹底的改變，一個國家國力增長速度，視工業化速度而有不同，而

且將影響崛起的新勢力進入國際體系，首先工業化的國家成長變得相對較慢，後起工業化的國家則崛起相當迅速。當一個國家完全工業化時即達到權力成熟期，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持續變遷，國力雖仍成長，但速度趨緩，一個國家的國際權力，極易因為權力爭奪，而被後來的大國追上反甚至成為落後的局面，亦即國力可能在此階段衰退，因為國家的權力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不是國家與生俱來的，當權力成熟期的國家權力成長趨緩，將是對手國進入第二階段權力成長期，迅速工業化提升國力追趕的好時機，結果是國際關係大幅改變。

工業化是權力增強之途徑，潛在對手國的工業化對既有強權而言，造成極大威脅，如果對手國國力強力又對現存國際秩序不甚滿意，要求更多參與國際事務以獲得更多國家利益時，將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和平隱憂。既有強權以增加有實力盟友的結盟方式，來確保權力。支配國（Dominant Nation）無法阻止對手國不工業化以提高國力，因為工業化同時也創造財富，提高生活水準。若支配國自私地讓對手國貧窮無助，恐招致怨恨和厭惡，面對對手國工業化而帶來的威脅，有三種因應方式，第一，透過國際援助和信用管控等措施，試圖延緩對手國工業化；如果這些措施仍無法減緩對手國快速工業化，則將試著促進顛覆對手國的政府，以另一個更順從的政權取代之或進行預防性戰爭，在對手國變強之前摧毀他；第三，若對手國已強到無法直接顛覆或摧毀，則支配國只好接受其工業化，並儘量幫助這國家，期待對方能心存感激，將來取代自己成為國際體系的支配者時，仍能維持友善關係。

國際權力是一個金字塔式的階層，由上層少數強權且滿意現行權力運作體系的國家與盟國共同維持。下層的國家為數眾多，貧窮落後且不滿於現行國際秩序運作規則者較多；上層的大國屬於工業先進的國家，在支配國建立維持的國際秩序下，獲得相當程度但少於支配國的利益，彼此互相幫助，以保持並分享權力優勢。但若大國中有不滿意現行國際秩序運作規則的強者，可能並未參與國際秩序的創立，支配國及支持者也不願分享新興大國既得的權力優勢，不滿意的強者成

為挑戰國，若現行權力體系不願分享權力，則另尋求建立自己的國際體系，以獲得更多的利益。如果支配國及盟邦的陣營實力與不滿於現況的挑戰國實力相當，而且支配國在對應政策上欠缺彈性，加上雙方不具備歷史或民族等友誼因素時，通常會引起戰爭，威脅國際和平，競奪國際秩序的建立與主宰，除非挑戰國的實力已明顯超越支配國，一個明智的支配國則可能和平調整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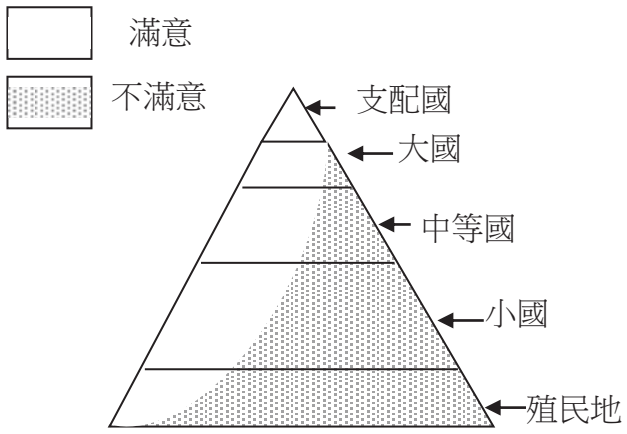


圖 2-1　國際權力金字塔與滿意程度

資料來源：Organski,1958:331

三、延伸探討

Organski and Kugler（1977）從歷史實證中分析，世界上的重大戰爭雖會暫時改變國際權力分配，勝方雖似藉由衝突獲益，但侷限於輕微利益，敗方短期內在國際權力階層遭受重大打擊，但長期而言，戰爭的影響將消散逝去，戰敗國將加速重建並恢復到戰前的榮景，甚至可能超越勝方的成長，然而，敗方的復甦與勝方的援助並無顯著關聯，因此，國際權力的分配，重新回到彷彿未發生過大戰。

Powell（1996）認為，國際權力的移轉，與國家雄心抱負的不確定程度有關，戰爭與和平，需視衰退國（the declining state）面對不滿於現狀的崛起國（the rising state）對國家利益的需求程度而定，若衰退的強權清楚知道崛起國的目標，則儘

可能滿足其需求；但若崛起國無限制地要求擴大國家利益，衰退國意識到必然面臨戰爭，為避免日久勢衰權頹，在自己國力尚強大穩固時及早發動，較為有利。衰退國讓步的底限，使其陷入權力分配的兩難，兩相權衡之下，衰退國愈早畫定讓步底線，戰爭的可能性愈高；但若其讓步能滿足崛起國的利益，結果將是和平的，無論如何，衰退國都無可避免地付出一筆不小的國際權力重分配代價。

Organski and Kugler（2008）從霸權穩定論與權力轉移理論，質疑美國霸權衰退的論點，認為美國雖然不會永遠主導國際秩序，但在可見的未來，美國仍將是世界權力的支配者。兩個理論都認為，世界權力分配體系主導國的衰退，將改變國際秩序，甚至可能導致戰爭。從霸權穩定論而言，單一霸權國創造並維持世界政權的安全體制，一旦霸權國國力衰退所引起的動態權力調整，恐產生國際衝突，新的領導者將重塑安全體制。Gilpin 和 Keohane 一致同意，當國力衰落的霸權無力負擔維持國際體系所需支出，而崛起的挑戰國有意創建新秩序時，國際衝突將隨之而來（Organski and Kugler, 2008:114-115），除非原霸權國建制體系中的大國盟友，願意放棄部分利益，共同承擔維持體系安全的成本。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秩序是階層式（hierarchical）的架構，權力分配的階層，決定國際權力的行使程度，尤其當雙方權力達到均勢，一個不滿於現行利益分配的大國，成功地挑戰並超越權力金字塔頂峰的支配國（dominant nation）及其盟友時，國際秩序將改變。

四、小結

從上述 Organski、Powell、Kugler、Gilpin 與 Keohane 的論點觀察，一致認同國際權力的運作是階層式的，位居國際權力頂端最強的支配國，與支持其理念的國家構築形成國際體系，建立並維持國際秩序順暢運作，並獲取不等的國家利益，滿意現行權力的運作模式與利益分配。然而，支配國不會是永遠的領導地位，國際社會出現國力迅速成長且不滿意現行權力分配的挑戰國，若其有意且有能力，

對國際事務的處理，進行更符合己國利益的安排，支配國將面臨選擇，該和平釋放權力，或在挑戰國國力尚不足勝過自己之前，發動戰爭以削弱其國力，但卻有可能錯估對手實力，無論如何，戰爭參與國都將付出極大代價。

Organski 先後提出的論述，承襲 1958 年提出的權力轉移模式，更集中探討戰爭可能發生的時點與狀況，1958 年時他曾經預測，具有挑戰美國支配領導地位的國家，主要為蘇聯、中國或印度，然而蘇聯已於 1991 年解體，而印度的大批貧民與基礎建設的欠缺（Ganguly,2010），阻礙發展成為足以匹敵美國的實力；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則因自從 1953 年至 1957 年起，每五年實施五年一期的經濟發展改革，將計畫經濟朝向市場導向經濟調整，據聯合國統計，2012 年國內生產毛額（GDP），中國大陸僅次於美國，達到 8,358,400 百萬美元（維基百科，2014）。雖然支配國的國力可能會相對衰退，甚至被挑戰國取代，但在此時此刻，Organski（2008）仍相當看好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能力，不會輕易被最具有挑戰實力的中國大陸所篡位，即使中國大陸的發展潛力仍難以估計。

綜上，隨著世界各國逐步且持續進行工業化，國際體系內的區域差異逐漸消失，國家間的權力分配，仍會因挑戰國的出現，以致相對權力消長，動態調整產生轉移，每一個支配國都將面對另一個挑戰國的崛起，而己國國力相對衰退時的因應，不斷重複著權力轉移的經驗，並牽動國際權力體系運作與世界和平。

貳、戰略三角理論

戰略三角理論從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概念衍伸而來，過去常被用於說明美國、中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只要三個行為者的關係狀況符合戰略三角理論的假設，其外交政策所引動的角色地位走向，在某種程度即可被歸納為該理論所描述的模型（Dittmer, 1981：485-486）。以下就戰略三角理論的基本內涵與動態平衡分述之。

一、基本內涵

Dittmer 建構的戰略三角類型規則，分為三角成立規則與三角互動規則兩種，前者以行為體的天然資源、經濟或軍事力量、科學技術發展程度等認定，雖各方行為者不必然具相等國力、資源或國際地位，但被認定為戰略三角的一方行為者需具備以下條件（Dittmer, 1981:486-489; 1987:3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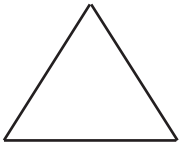
1.兩兩行為者互動帶來的正面或負面價值關係，每個行為者將選擇友善（amity）勝於敵對（enmity）。

2.國力強弱的權力對稱性，大國較能提供弱小國安全保護，以結盟方式擴大權力優勢，而小國若不與之結盟，則將尋求另一大國的澤被，或均不結盟，沒有持續穩定與固定行為者合作的必要性。

3.任一組雙邊關係都受到個別與第三方行為者關係的影響。

4.任一方行為者都有完全自由決定戰略操作的獨立性，即可以政治或軍事力量改變戰略平衡。

在確認戰略三角關係成立後，三方互動前提係假設每一方行為者都追求最大的自身利益與最小的風險或損失，意即行為者是理性決策，而三方行為者關係類型的變化，受到上述規則變項影響，所發展出三個行為者的互動關係呈現四種類型，分別為三方各兩兩友好的三邊家族（M'enage a trois）型、一方與另外兩方均友好，但另外兩方卻彼此敵對的羅曼蒂克（Romantic）型、兩方友好但該兩者均與第三方敵對的結婚（Marriage）型、三方關係均敵對的單位否決（Unit-veto）型（包宗和，1999:339-340）。



三邊家族型



羅曼蒂克型



圖 2-2　Dittmer, Lowell 的戰略三角類型

資料來源：包宗和（1999:339-340）、Dittmer（198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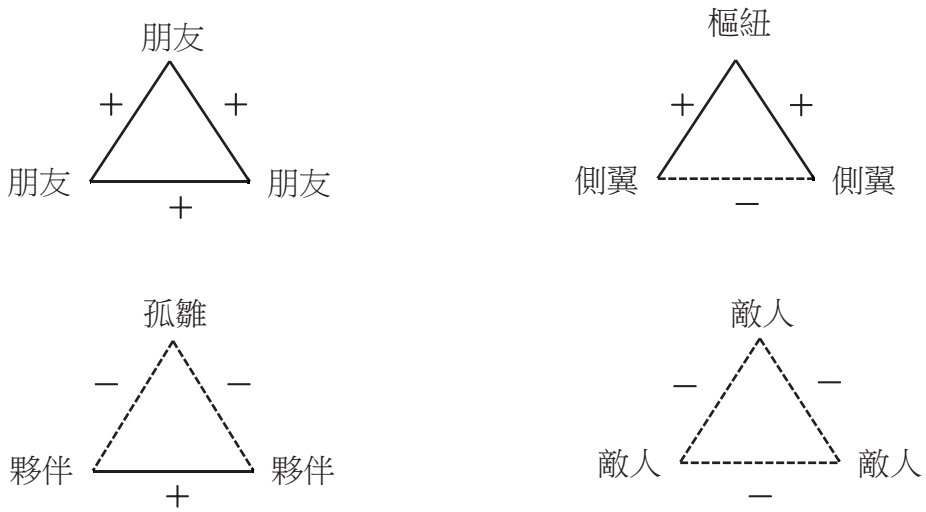
此四種類型的每一方都追求與另兩方或至少某一方維持正面關係，避免同時與其他兩方交惡（包宗和，1980:34-36），並儘量防止另兩方的惡意共謀（Dittmer,1987:33），Dittmer（1987）認為，基於各方行為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三邊家族型三角是各方達到平衡與最小成本持續下去的類型，但對個別行為者而言，以自己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才是對自己最有利類型。

國內學者羅致政從結構平衡理論解釋美國在臺海兩岸所扮演的角色，基於結構的平衡要求：「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我的敵人，以及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羅致政，1995:39），若任一組雙邊關係為友好，則給予正號（＋），若為衝突關係，則給予負號（－），三角結構的平衡穩定，在於該三角中擁有偶數個負號關係，反之則不平衡不穩定（羅致政，1995:38-39）。依羅致政的結構平衡看法，當 Dittmer 建構的戰略三角類型呈現三邊家族型或結婚型時，為平衡穩定的互動結構。

吳玉山（1997:177-183）指出，戰略三角行為者互動的內在與外在因素，決定關係好壞，並賦予各類型的行為者角色定位分為 6 種[1]，依角色優越順序分別為：樞紐、朋友、夥伴、側翼、敵人、孤雛，各角色對應於 Dittmer 的戰略三角

[1] Dittmer 曾提及戰略三角的 4 種類型中，結婚型三角與羅曼蒂克型三角的角色名稱為 spouse, pariah, pivot, wing（1987:33），吳玉山在此予以調整、增列名稱，普遍成為目前國內戰略三角研究之依據。

類型如下圖：



正面友善關係：————

負面敵對關係：----------

圖 2-3　各類型戰略三角與角色

資料來源：吳玉山[2]（1997:180-182）、Dittmer（1987:34）。

三角中的任兩方關係如為親善（amity），用正號「＋」表示，如為敵對關係（enmity），則用負號「－」表示，樞紐與側翼的角色，出現於羅曼蒂克型三角；孤雛與夥伴的角色，出現於結婚型三角；朋友的角色表示三邊家族型三角；敵人的角色則適用於單位否決型三角，因為每個角色地位有優劣順序，故較不利地位者必然具有「提升角色」的動機（吳玉山，1997:171-183）

上述各三角類型中，兩兩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優劣，由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共同決定。內在因素指任兩方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政策，會互相影響國家利益；外在因素則與 Dittmer 所述的相似，即任一組雙邊關係都受到個別行為者與第三方關係的影響，內在與外在因素對兩國關係的影響，「必須依個別的情況來認定，未可一概而論。」（吳玉山，1997:174）。符合前開 Dittmer 建構戰略三

[2] 吳玉山（1997:180-182）所繪戰略三角均為實線，並以正號（＋）表示友善關係、負號（－）表示敵對關係，並未以虛線表示敵對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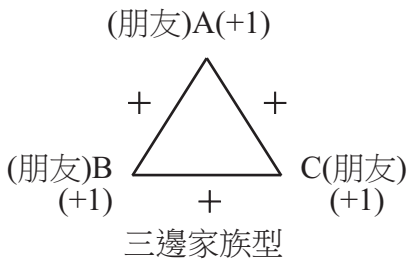
角的前提假設，每個行為者都屬理性決策者。

二、動態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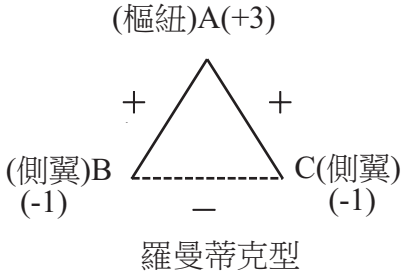
國內學者包宗和續就 Dittmer 的戰略三角類型，以及吳玉山對戰略三角的角色定義，進行量化分析，不僅歸結出三方行為者「提升角色」的走向與三角類型的變化，更從個體面與總體面，提出戰略三角的動態均衡（包宗和，2009）。

戰略三角角色量化定位的規則有三項，首先，三方彼此間可合作也可對抗，具政策決定的自由空間。其次，任兩方合作優於對抗，另兩方的合作均不利於己方。第三，任兩方中若有一方對另一方的支配力變強，將使戰略三角關係轉變成不利己方的零和賽局（包宗和，1999:342-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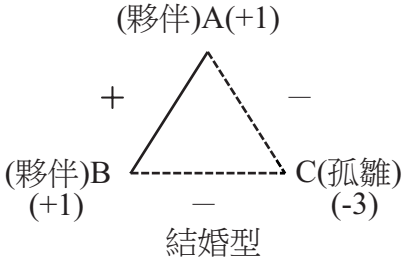
戰略三角角色效益的計分方式，是「自己與另外兩方雙邊效益之加總，再減掉另兩方間之雙邊效益」（包宗和，1999:344），任兩方之間的互動，若對自己有正面利益的友善關係，則雙方各給正 1 分，有負面利益的敵對關係，雙方各給負 1 分，而另兩方的友善或敵對關係，將成為己方的負分或正分（包宗和，1999:344-345），因此，在量化指標定位下的戰略三角呈現以下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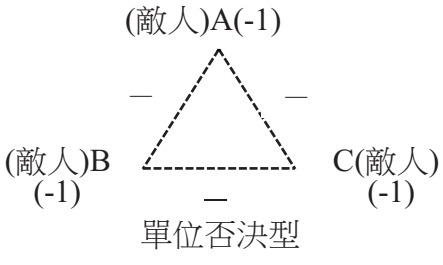
三邊家族型



羅曼蒂克型



結婚型



單位否決型

圖 2-4　量化定位下的各類型戰略三角角色得分

資料來源：包宗和（1999:343）。

戰略三角個體論依據理性決策的精神，個別行為者均有追求自己國家利益最大或損失最小的決策傾向，並致力提升自己在三角中的角色地位得分（包宗和，1999）。

經由上述量化定位後，戰略三角角色得分最差者為孤雛（-3），最佳角色得分為樞紐（+3），角色效益大小為「樞紐＞朋友、夥伴＞側翼、敵人＞孤雛」，基於戰略三角理論的前提假設，即各方行為者追求最大化自己利益，並最小化自己損失，若處於最差地位，必有改善現狀以提升角色的動力，從負 3 分孤雛逐級提升，若達到正 3 分的樞紐，則為得分最高地位（包宗和，1999）。

個別行為者要提升地位，以高一級的地位循序漸升，如從最差得分的孤雛（-3）角色開始，即另兩方友好的結婚型三角，要提高一級到側翼或敵人（-1）角色，則需破壞另兩方的友好以形成單位否決型三角，或爭取另兩方中之一方的友好關係，以形成羅曼蒂克型三角。接下來的第三階段，若上一階段形成單位否決型三角，必須爭取與另兩方中的一方和睦，以形成結婚型三角，提升自己角色至夥伴；或由側翼的羅曼蒂克型三角，進一步與第三方建立友善關係，形成三邊家族型三角，提升自己到朋友角色。當自己已居第三階段中的夥伴角色，如能與敵對的一方建立友善關係，將更擴大自己的利益，於是進入以自己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或第三階段為三邊家族型三角，為避免另兩方惡意合謀損害己身利益，便想辦法破壞另兩方的友好關係，亦將推升自己到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包宗和，1999:345-347）。

因此，在戰略三角個體論中，個別行為者追求角色提升，所展現出的戰略三角角色與類型變化走勢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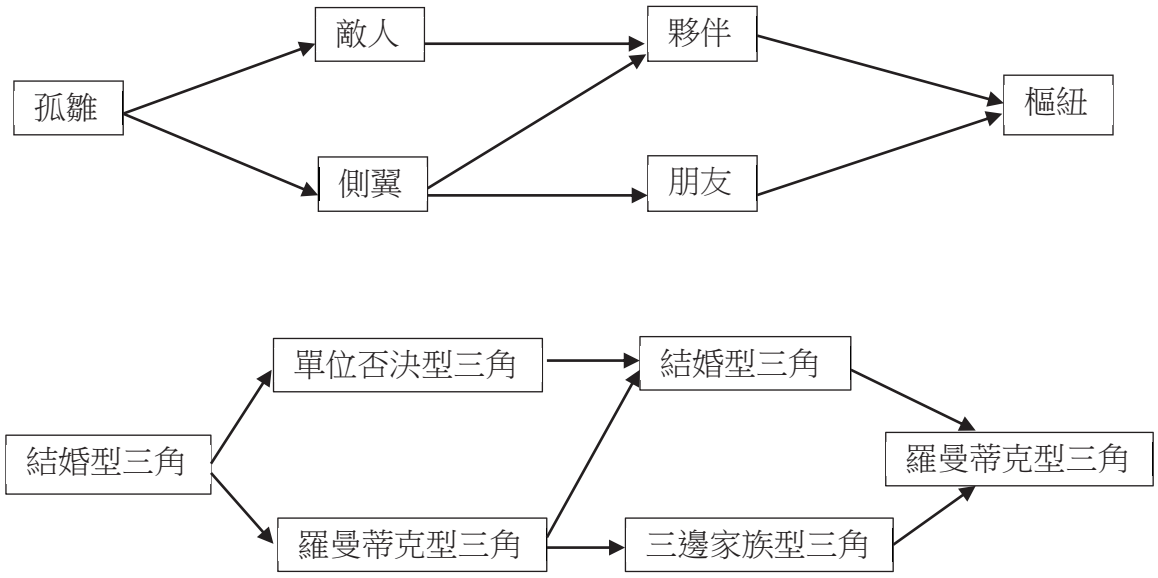


圖 2-5　孤雛地位者提升角色走向及三角類型變化

資料來源：包宗和（1999:346）。

另外，總體戰略三角理論則從各類型三角的整體利得與整體利得在三方間的分配，比較各類型的穩定度，獲致結論為三邊家族型三角係穩定度最高的類型，整體利得最高，相對安全感高，衝突可能性低，按穩定度排序依次為羅曼蒂克型、結婚型、單位否決型（包宗和，2009:337-345）。

綜觀戰略三角個體論與總體論，任一方均同時追求提升角色地位，希望成為樞紐位置，在此動態過程，會趨向動態均衡，成為三邊家族型三角，雖然對個別角色而言，樞紐地位對自己獲利最多，但戰略三角的整體利得最大時，才是最穩定，對各方都有利的國際關係型態，此結果亦符合 Dittmer 所述，三邊家族型三角是最可能平衡的類型（Dittmer,1981:489）。

三、小結

Dittmer、羅致政、吳玉山與包宗和等人，逐級發展完整建構了戰略三角的理論基礎，並繼續從國際社會實際現況為例，分析三個行為體的歷史互動，對雙邊關係造成好或壞的影響，如何牽動三角模式的變化。而華盛頓、北京與臺北的關係，是國內學者研究戰略三角理論普遍用以說明的實例，Dittmer 也長期關注此戰略三角的變化；當然，美國、歐盟與中國大陸的三角關係（Shambaugh,2005）、莫斯科、北京與德里的戰略三角（Pant,2004）、中國大陸、俄羅斯與美國的戰略三角（Hsiung,2004）等也廣為學界探討，不論各學者探討的角色對象為哪三個，研究內容均不偏離戰略三角理論提出的架構，而以一段歷史期間檢證三方行為體關係好壞的變化，如何牽動三角類型的變動。

然而，戰略三角理論與實證的研究中，對角色國力的差異較少著墨，亦即行為體國力的消長，與對權力分配的企圖心，如何影響友好支持或敵對不合作的政策決定，以提升自己的國家利益。權力轉移理論明確指出，國際權力的運作規則，以及權力爭奪過程的心態，因此本文將權力轉移理論的權力攻守心態，運用於戰略三角理論中三方行為體的決策心態，推導國家成長過程中，如何考量友好與敵對的分際，同時檢視這三方關係的變化，是否符合戰略三角理論的角色地位提升路徑，兩種理論的融合，更擴大了各該理論的闡述領域。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途徑

Organski 於 1958 年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與 Dittmer 提出的戰略三角理論的要件，均為國家領導人的理性決策，因此，本文將從理性選擇途徑，分析三方行為體的決策者在國際權力轉移過程中的主要心態，如何決定互動關係的好壞，以影響己國在三角中的利益，進而影響三角關係變化，此一變動趨勢，如何回應三方整體利益最大及劣勢者提升地位的走向。

理性選擇從行為者是理性的原則，以演繹的方法推導出一系列前提假設，進而建立模型（宋蕙吟，2003），主要係追求預期效用極大化（盛治仁，2003）或損失最小化，理性選擇理論的核心論述為：「當面對許多行動路徑時，人通常會依照其所認為最能產生總體最佳結果的方式來行事。」（陳義彥等譯，2007:75、Elster,1989:22）。雖然學界對理性選擇有諸多批判，但即使是在人的有限理性，或資訊不充份之下，仍在這些限制條件下的情況，考量效用極大的選擇，因此，理性選擇途徑仍有其重要性。

本文的三方行為者在已界定的權力轉移期間，依循理性決策原則，將拉攏支持者以對抗威脅或壯大自己聲勢，或分化對手陣營、挖其牆角、動之以利等方式，自主決定當下與另兩方關係的和睦或交惡，而這也將視其國家目標而定。

貳、研究方法

本文的性質為質化研究，在權力轉移理論與戰略三角理論的理性決策原則之下，蒐集和處理資料的方法，傾向以理論演繹方式進行，演繹取向強調，「理論的發展或建構，必須藉由一組抽象的預設，根據它們來演繹出一組可以檢驗的研究假設。」（簡守邦譯，2002：149）。

就戰略三角理論提出的角色地位提升路徑與均衡三角，加入權力轉移理論對角色及時間演變的定義後，檢視權力發展轉移階段的歷程，推論三方關係組成的戰略三角變化軌跡，以更具體說明戰略三角理論的邏輯。

第四節　預期成果與研究限制

戰略三角理論以各方行為者國力不必相等，但需具備特定互動條件始能成立，因此，本研究係具有戰略關係、各有自主決策權的三方，因工業化造成國力變動，在權力轉移理論的情形下，推導戰略三角類型變化的走勢，並分析該走勢與戰略三角理論所提出，個體角色地位提升路徑與總體穩定的三角類型之異同，藉以看出權力轉移因素對戰略三角行為者的決策影響。

依 A.F.K.Organski 對權力轉移的分析（1958:299-338），我們身處工業革命的迷霧中，現今的時期是非比尋常的時期，他將國際關係歷史切分為三個時期（period），第一個時期是工業革命還未開始，所有國家都尚未開始工業化，國家權力尚在萌芽中。第二個時期從英國發生工業革命而開啓，國家權力差異巨大，從權力轉移角度而言，此時期兼具權力轉移的三個階段，即潛在權力期（The Stage of Potential Power）、權力成長期（The Stage of Transitional Growth in Power）、權力成熟期（The Stage of Power Maturity），在此時期，先進行工業化的國家發展極快，相對於其他國家擁有權力上的優勢，但隨著其他國家陸續工業化而提升的國力，先期工業化的大國將備感壓力，這也正是人類目前所處的時期。第三個時期在未來，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完全工業化，亦即所有國家都進入權力轉移的第三階段權力成熟期，雖然國力彼此仍有差異，但工業化造成的國力及財富差距不大，可能有工業成就以外的因素影響，將需要新理論以詮釋國際權力分配（Organski,1958:306-307）。

以下將就戰略三角在權力轉移階段中的互動，劃分三個期間，先分析可能產生的戰略三角類型；其次探討戰略三角類型變化如何回應戰略三角個體論與總體論。

壹、權力轉移期間之戰略三角可能類型變化

除承襲戰略三角理論與權力轉移理論相關假設外，為求分析之便，本文另有

若干條件。

挑戰國與較小國都假設各有一個國家，全球因工業化產生一個具壓倒性優勢的權力支配國 A，建立並維持世界秩序的運作，面對人口稠密、領土廣闊的大國 B，因推動工業化而迅速提升國力，B 逐漸不滿於現行體系內的利益分配，並以挑戰者之姿要求享有更多支配國的層峰權力；同時，國際體系中有天生條件偏弱、高度工業化而且國力相較 A 與 B 均小的 C 國，滿足於在現行體系規則內獲得相對較少的國家利益。

依據下圖所示，按照 A 國工業化的國家權力程度，分為階段 I 潛在權力期、階段Ⅱ權力成長期、階段Ⅲ權力成熟期。在階段Ⅲ劃分為 3 個期間，當 A 國發展至階段Ⅲ的初期，即 B 國處於尚未或準備推動工業化時期，稱為第①期間；經過 A 權力成熟期的階段Ⅲ，B 則在第②期間進入權力成長期，大力開展工業化，國力起飛；至第③期間即 B 國即將進入權力成熟期，國力與 A 相差不遠的階段Ⅲ後期，藉由釘住 A 與 C 的國力發展，主要觀察 B 的國力上升，三者互動所導致的戰略三角變化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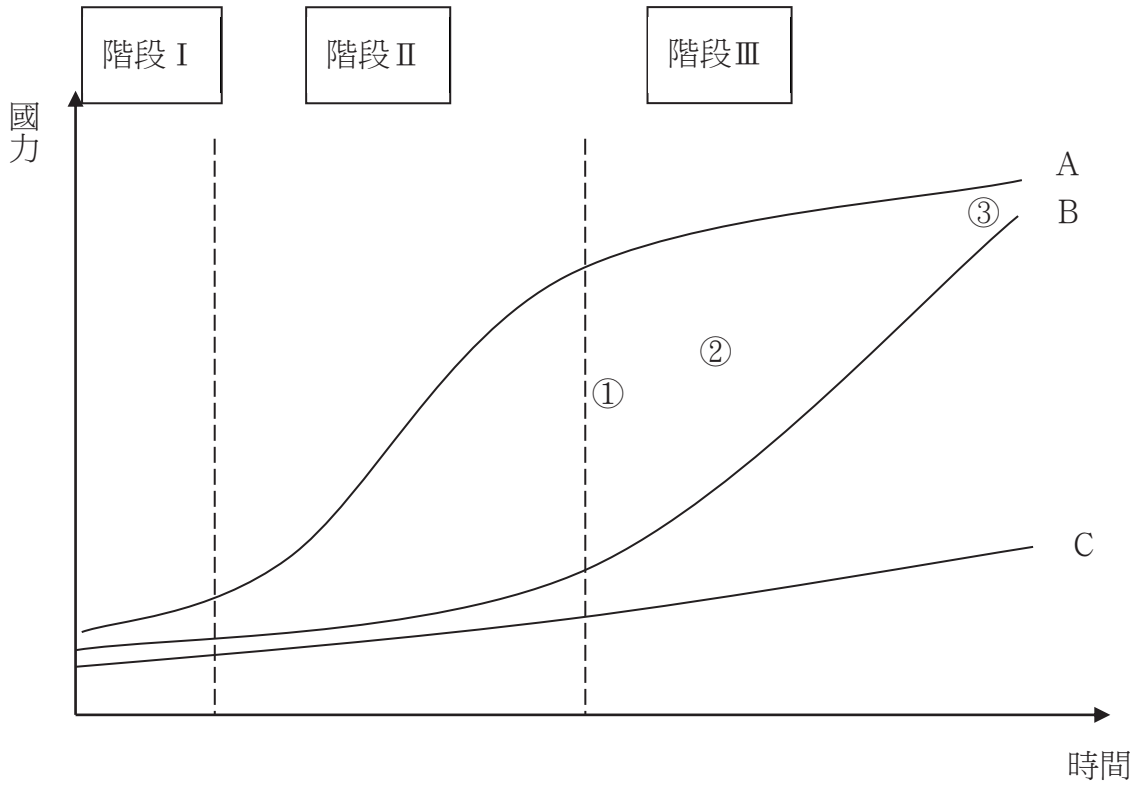


圖 4-1　權力轉移理論下之三方互動階段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一、挑戰國尚未工業化

（一）三方國力

依圖 4-1 所示，在期間①，大國 A 已達權力轉移理論所稱的權力成熟階段（The stage of power maturity），是完全工業化國家，科技依舊快速變遷，經濟效率極高並持續上升，國民所得持續增加，但增加率不如以往，政府組織的強健與效率甚於從前；在某些領域仍有改善空間，諸如財富的生產與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準、身心健康、較佳的教育、和諧的民族關係等方面。但此權力成熟階段國力的增長速度，無法像早期倍數的成長，生活水準的改善不再被視為奇蹟；死亡率不再大幅降低，因為世紀性流行疾病較能獲得控制；人口不再躍進式的成長；國民情感不受限於早期權力成長期的民族主義。A 國因為完全工業化帶來財富的增加與國力的增強，使 A 成為世界體系的支配國（dominant nation），建立並維持國際秩序，從國際運作規則中獲得最多的國家利益（Organski,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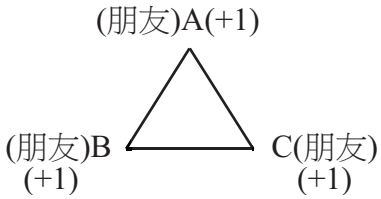
在期間①，大國 B 國尚未開始工業化之路，位於潛在權力期過渡至權力成長期的階段，潛在權力期的國家，人民仍以原始農業為生，大多居住在鄉村，單位生產力低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準都不高，科技不發達，正規教育不被重視；人口數穩定，即使有增加也很緩慢，政府組織缺乏效率，甚至是被一小群人掌控國家，政府的主要功能在建立並維繫國家統治權力（Organski,1965:7-9），因此，國家權力相當穩定，即使政權波動，但波動程度相較於工業化所造成經濟現代化的權力增長，仍屬有限，該等國家的國力，難以與任何一個已進入工業化的國家相提並論。類此國家的權力潛力，在於國家的大小，如果它很小，例如人口很少，或缺乏資源，即使進行工業化，也依然是個小國；如果一開始就是個有潛力成長的大型國家，它將經由工業化而使權力潛力獲得完全發揮（Organski,1958）。本研

究假設 B 國擁有成為大國的條件，故 B 未來將經由工業化使國家權力大幅增長，成為挑戰國際權力支配者的實力。

C 國是工業化的小國，國家天生本質較 A 與 B 小，例如領土狹小、人口有限、天然資源缺乏。國家目標在於累積財富、保存文化並和平生存，財富雖可增加對國際事務參與的權力，但 C 國並不以主導國際事務秩序為目標，願意依照現在主要國際體系運作規則從事活動以獲取國家利益。

（二）三方關係可能型式

在此期間，工業化的小國 C 認同 A 國發展所帶來的改變，接受 A 的自由化等政治、軍事、文化的價值觀；而 A 身為世界最大強權，照顧較小國家責無旁貸，因此 A 與 B 或 C 關係均友好。A 因工業化帶來財富與國力成長，在權力成熟期具支配國際事務的實力，鼓勵並幫助 B 發展工業化，以脫離貧窮，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推動經濟發展，並欲將民主、自由等由 A 主導體系內的普遍理念傳給 B，當 B 看到未來工業化所帶來的國力增長藍圖，願意與 A 維持友好不交惡的關係。至於 B 與 C 之間，若無特別敵對的理由，在理性原則下，與對方維持不差的關係，對己國有利。此時戰略三角模型可能為三邊家族型三角。



二、挑戰國開始迅速工業化，國力發展迅速

（一）三方國力

在圖 4-1 所示第②期間，A 已是權力成熟期的國家，而 B 正開始迅速工業化，進入權力成長期，A 在 B 開始進行工業化時，會幫助 B，自前揭權力轉移理論可知，推動工業化不止有助國家邁向更高國際權力殿堂，也是走向富裕之路，一個

已完全工業化的權力成熟國家，若阻止具潛在競爭威脅的國家推動工業化，同時代表阻止他國改善生活水準，將招致國際社會反感（Organski,1958:309）。

在期間②，人口稠密、領土廣闊的 B 國正快速開展工業化之進程，進入權力成長期的 B 國，在財富及國家權力均快速增加，迅速追趕上已工業化國家。國家內部產生巨劇變遷，新興資產階級興起，取代傳統貴族，取得國家統治權，不論是資本主義（Bourgeois Politics）、史達林式（Stalinist Politics）或法西斯式 (Fascist/Syncratic Politics)的政府都經歷此種政治權力的轉移，政府的主要功能在幫助國家推動工業化，抑制消費、鼓勵儲蓄以累積資本進行工業投資，同時，政府負有責任管理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及勞動力素質的提升教育，雖然生活水準較尚未工業化前提高，但廉價勞力的情形普遍存在（Organski,1965:9-12,56-157）。工業化帶來的影響，已遍及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領域，這些改變所帶來財富的累積，增加 B 國影響其他國家行為的程度，亦即，增加國家權力。

B 國一旦因為工業化發展起來，使國力和財富迅速累積增長，速度比先前已進入成熟期的國家原需時間更快，將儘量與各國友好，避免失去經濟工業發展的果實。工業化增加的經濟實力，展現在與技術落後地區的互相依賴，例如中國與非洲自 2000 年起於產業、科技等領域的合作；[3] B 增加的財富與技術能力也提升其軍事力量，可提供小國某種程度的防衛。

目前 B 對國際權力是滿意的，至少並未不滿到想爭取更多政治權利，因為 B 的重心在財富增長與國力提升，此時的 B 雖顯然具備大國形象，但崛起的國力尚未威脅到 A 在國際體系的領導權威，一個聰明的挑戰國，經由國家內部工業化發展而在權力上提升，會忍住威脅現存國際秩序的意圖，直到它累積足以匹敵支配國與盟友的實力時，再作評估（Organski,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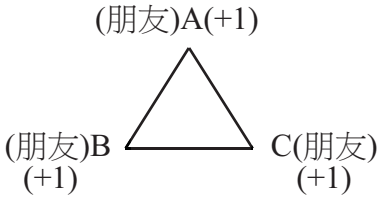
就 C 而言，身為工業化的小國，在現行國際秩序中找到一個位置，獲得特定國家利益（Organski,1958:329），與 B 的經貿往來，對自身國家利益有利，故將擴

[3] 中非合作論壇（http://www.focac.org/chn/）。

大經貿交流；至於與 A 之關係，沒有劇烈負面變動因素干擾友誼，仍維持友好。

（二）三方關係

在此期間，A 早已達權力成熟期，雖仍持續工業化，但國力提升速率變緩，身為世界秩序的建立者，有責任幫助其他國家工業化，以展現大國風範，寄望被幫助的國家日後壯大後，能支持 A 所建立體系的理念價值；同時，B 因為快速工業化累積財富，國力迅速提升，嚐到工業化帶來的益處，在可行的範圍內，儘量與各國友好，故與 A 及 C 維持友好；至於 C，因為是工業化的小國，若世界各國願意與之維持友善關係，在理性原則下，接受與 A 及 B 維持友誼，因此，延續朋友關係的三邊家族型戰略三角。



三、挑戰國國力高漲，不滿足於現有國際體系的地位

（一）三方國力

在第③期間，A 國力增長的內部特質並未消失，持續增加但速度不若以往，甚至可能比其他國家減緩，導致國家的權力可能在權力成熟期衰退，即使這個國家持續成長的更富裕，更工業化和更有效率。權力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視一個國家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工業化程度而言，雖然一個國家一直在成長，但其他國家若成長速度較快，國力仍將相對被削弱。在權力成熟期國力的衰退，無涉該國家本身，而是因為其他國家進入第二階段的權力成長期，以致 A 的相對權力衰退，進入權力成長期的國家，開始拉近與較早工業化國家所形成國家權力的差距。因此，世界各地不同的工業化範圍，將導致權力轉移，權力並非自動平衡

（Organski,1958）。

在第③期間，B 因工業化帶來國力迅速上升，但相對而言，其從現行國際規則中所獲得的地位優勢並未相對提高，B 會想要求多些權力利益的分享，對 A 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形成了挑戰，對既有強權國的領導構成極大威脅，可能干擾世界和平。A 雖得以增加大國盟友的方式來確保權力體系不崩解，但無法阻止挑戰國不因工業化而壯大，面對 B 的威脅，A 有以下方式因應（Organski,1958:308-311）：

1.如果被威脅的國家本身力量強大，則 A 一開始就安撫對手國 B，例如運用細微影響力，透過調整國際援助和信用管制，鼓勵潛在對手 B 多出口農產品和原物料或發展輕工業，以取代重工業等資本投資；如果這些政策都不適合，試著鼓勵 B 國國內反對政府的力量以顛覆政府，以另一個更順從的政權取代之；最後，A 可能發動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在競爭對手變的夠強壯去擾亂現存的世界秩序之前摧毀他，以結束可能的麻煩，此時，戰爭的風險將最大。

2.採取措施試圖延緩對手工業化，不實際直接干預，例如貿易壁壘，禁運措施，或拒絕給予各種援助，並說服盟友國共同參與，例如美國與歐盟自 1989 年以來對中國大陸實施高科技武器禁運措施。這會傷害一個新興發展國家的成長，但不會停止它工業化，即使 A 國人民關心 B 國的貧窮與疾病，但 A 國政府卻無意幫 B 國工業化，因為 B 國政府已開始成為 A 國的勁敵。

3.事先讓步以避免戰爭，接受 B 國工業化，並儘可能地幫助這國家，從道德層面期待將來 B 成為強權時，彼此仍能保持友好關係，並確保權力相對衰落後的 A 能在新秩序中保有一個較高地位。

當 B 國國力愈來愈成長，力量強大到可以支配國際事務，發現現行國際體系的支配國追求的其實也只是自身的國家利益，並非真心為世界各國謀福利，B 國因為快速的工業化帶來各層面的提升，擴大了人類的慾望與比較下的不滿，產生很多內部損傷與不平怨氣（Organski,1958:328-329），國家為轉化國內民眾對政府的批評，引導一些不滿的意見，朝向關注國家對外的積極侵略性態度和行動。如

果 B 國內部開始出現意見，不滿意國家在國際體系的地位，迫使 B 國向現行體系支配國挑戰，要求更多的利益分享，符合 Organski 認為的，「典型的新興強國都是國際上的麻煩製造者」（1958:440），AB 關係可能出現以下情形（Organski,1958:308-311）：

1.如果支配現行國際秩序的 A 國，願意放棄部分利益，與 B 分享大國權力，歡迎新來的挑戰者進入權力層峰階級，則 A 與 B 可和平相處。

2.然而，若挑戰國無法藉由和平手段獲得想要的改變，而且不願意接受處理國際事務的附屬地位，認為唯有成為支配強權，建立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國際規則，才能給予自己更多的國家利益和特權，B 將等待時機，累積實力直到足夠與支配國相匹敵時，轉向發動戰爭，威脅現行國際秩序，以獲取自身利益。

3.但若挑戰國實力強大到可以主宰國際運作秩序，則其與支配國之間的衝突的風險將降低，挑戰國不必公開攻擊支配性強權，只要在權力成長上勝過它即可，例如當國際糾紛產生時，涉事各國願接受挑戰國之排解而不採用支配國的建議；支配國了解到它即將失去對國際規則的主制權，於是有強烈動機避免戰爭的成本，並使自己成為和平調整者。

不論挑戰者接受現存國際秩序並僅希望接管領導權，或挑戰國想創建一個自己的新秩序，和平調整都是可能的，只要挑戰國願意繼續遵守現存國際秩序；但若非如此，挑戰者想破壞現有秩序，將走向戰爭（Powell,1996）。

從現今局勢觀察，中國大陸經濟的急速發展，使其儼然成為最具挑戰實力的國家，雖然中國大陸表示，即起崛起也不會稱霸，[4]但近年來中國大陸不僅提倡「中

[4] 新華網網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14/content_13171135_3.htm，2010/3/14，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中國是否有這個能力以及意願在國際舞台發揮更大的作用？」回答：「…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發展不會影響任何國家，中國不發達的時候不稱霸，中國即使發達了，也不稱霸，永遠不稱霸。」ETtoday 新聞網頁，2012，〈習近平：中國永遠不會稱霸　即使將來發展起來〉，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708/71485.htm#ixzz2BKXvxTbT，2012/7/8，「…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7 日於北京的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表示，中國對於和平的發展方向會繼續堅持，『中華民族講信修睦，中國始終奉行和平外交方針，中國將來發展起來了也永遠不稱霸。』…。」

美新型大國關係」，[5]更在南海主權爭議等亞洲事務爭取主導地位，跡象顯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正在逐漸揚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戰略思想，而轉向『有所作為/大有作為』的新取向」（王建偉，2013）。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美國獨霸全球，聯中制蘇的戰略已毋需要，美國將更關心的是，一個經濟實力快速成長的中國共產國家，在全球發揮漸增的影響力，雖然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尚未能與美國匹敵，但仍屬不可小覷的對象，因此，歐巴馬總統致力於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6]彰顯美國維持國際秩序的能力與地位，當然也遍及於亞洲地區的權力分配。

當所有國家工業化時權力都成長，尋求在國際秩序中的更高位置，然而，若一國太小而無法與支配國同等權力時，即使小國完全工業化，也無法成為具威脅的挑戰者，較不易有戰爭危險，除非小國與真正強有力的挑戰者結盟（Organski,1958:329-330）。故在 A 與 B 國力靠近的第③期間，C 國原則上不會成為國際麻煩製造者，因為 C 滿意現狀，也缺乏實際實力改變現狀，在現行由 A 領導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雖獲利有限，但比起體系變動未知的未來，寧可在現行秩序中較為安穩。

（二）三方關係

由上述三方角色心態分析得知，第③期間三者的戰略三角可能類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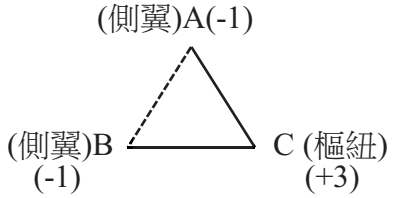
1.當 B 開始逐漸不滿足於現行國際秩序下的地位，想向 A 要求分享更多權力或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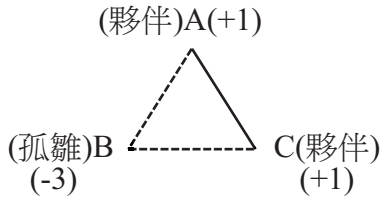
[5] 新華網網頁，〈中美新型大國關係〉，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3-06/07/c_124827138.htm，2013/06/07，該文就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一詞的由來做了簡介，主要係 2012 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提出，2012 年 5 月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亦予闡述，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後，「新型大國關係正式成為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2013 年 6 月 7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定義其內涵主要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與合作共贏。

[6] 2011 年 11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指出，「為了維持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導地位，為了確保美國的利益，為了推進美國的價值，在今後的 10 年中，美國必須精明而且有系統地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亞太地區，在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重要領域增加對亞太地區的投資。」（美國之音網頁，2011，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2011-obamas-asia-trip-133881693/846234.html ，2011/11/23）。中國將之視為美國重返亞太地區的「高調宣示」（外交觀察網頁，2013，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9224，2013/1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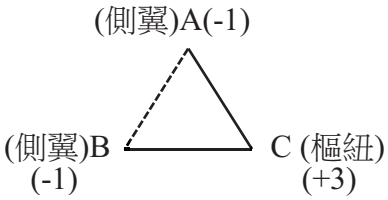
源，更多參與國際事務運作的權力，而 A 顧忌 B 未來的權力可能凌駕自己，一開始先自行阻撓 B 的要求，不論是公開或私底下的手段，以減緩 B 工業化的速度，A 認為尚且可以自行制裁 B，而未要求盟友共同制裁，故 C 暫時與 B 維持經貿交流以獲取利益，因此，戰略三角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



2.若 A 對 B 的制裁無效，則試圖拉攏 C 要求共同反抗 B，或暗中幫助 B 國內的政治反對力量顛覆 B，或在 B 壯大到足以超越 A 以前，發動預防性戰爭摧毀 B；當 C 不確定若 B 另外建立一套國際秩序時，自己的位置及利益何在，有可能會站在 A 的陣線共同反對 B，而形成 AC 夥伴的結婚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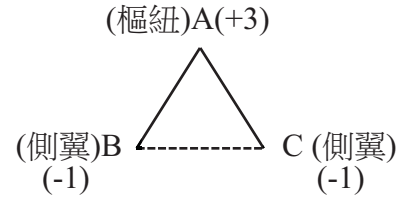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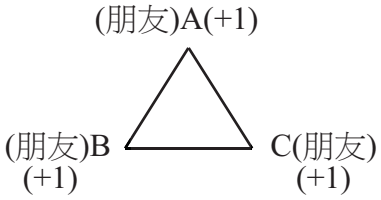
但 C 也可能不理會 A 的要求，眼見 B 已明顯壯盛，自己比 B 小，力量有限，如與 A 共同對抗 B，若未達預期壓制效果，未來恐陷自己國家於不利之地，C 在理性決策下，仍與 B 維持原本關係。



3.若 A 對 B 的制裁無效，B 毋須公開攻擊 A，A 明白 B 的國力強大到可以支配國

際事務，自己即將失去對國際規則的支配能力，為避免戰爭徒耗成本，並使自己和平調整國際地位，以確保國力相對衰落後，能在新的國際秩序中，保持一個比較高且不算太差的地位，A 能尊嚴地讓位，因此修復 AB 關係；C 若能在 B 即將建立的國際秩序中，獲得自己的國家利益，會選擇與 B 保持友好關係，最終都將朝向朋友關係的三邊家族型三角調整。





四、小結

從上述推論可知，在權力轉移理論之下，完全工業化的支配國與較小國，面對經由工業化迅速崛起國力且不滿於權力現狀的挑戰國，三者互動可能產生關係的變化，如以戰略三角理論所述三角類型說明其走勢，係從三邊家族型三角開始，並於 B 國力提升時繼續維持；當挑戰國 B 的國力接近支配國 A 時，A 感到受威脅，將走向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在 A 加強阻擋 B 國力擴大的過程中，將暫時分為兩種路徑，即 AC 結婚型或維持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在 AC 結婚型三角的情形下，當 A 感到壓制手段無法有效阻擋 B 的成長與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將與 B 修復關係，成為以 A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而不論哪一種羅曼蒂克型三角，交惡的那一組雙邊關係，必尋求恢復和好以促進自身利益，故最後均演變為三邊家族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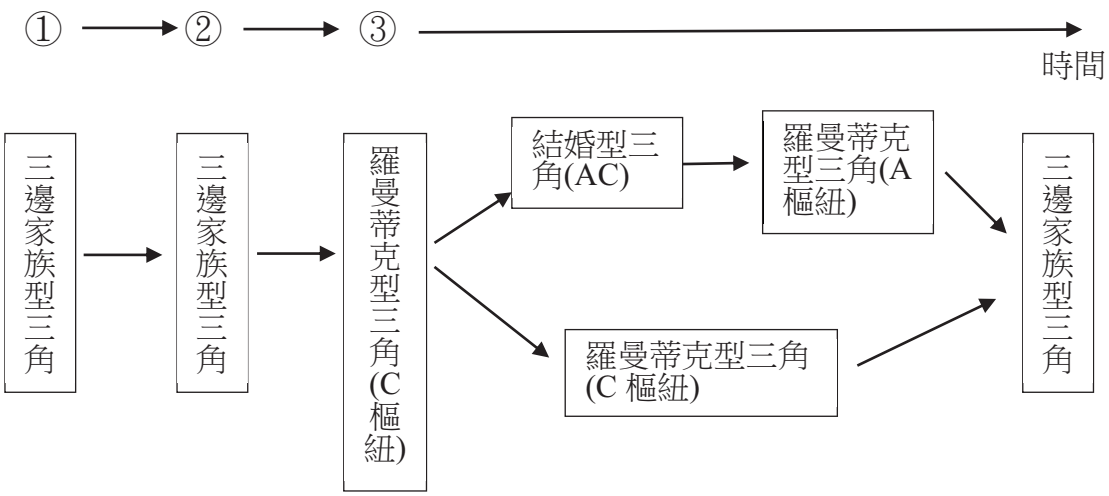


圖 4-2　權力轉移下之戰略三角類型變化走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推導繪製。

貳、權力轉移理論下戰略三角類型變化走勢與戰略三角理論之分析

從上開權力轉移理論下的戰略三角變化走勢，歸結出各國地位得分變化情形如下圖，戰略三角從第①期間的三邊家族型，經過第②期間，逐漸走向第③期間初期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嗣可能變成 AC 結婚型，再回到以 A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或在第③期間繼續維持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但最終都將走回三邊家族型。A、B、C 三者個別的角色得分，在過程中可能因為權力差距或霸權等因素的綜合考量而暫時下降，但其變動結果仍將朝向三邊家族型三角，即三角整體利得最大的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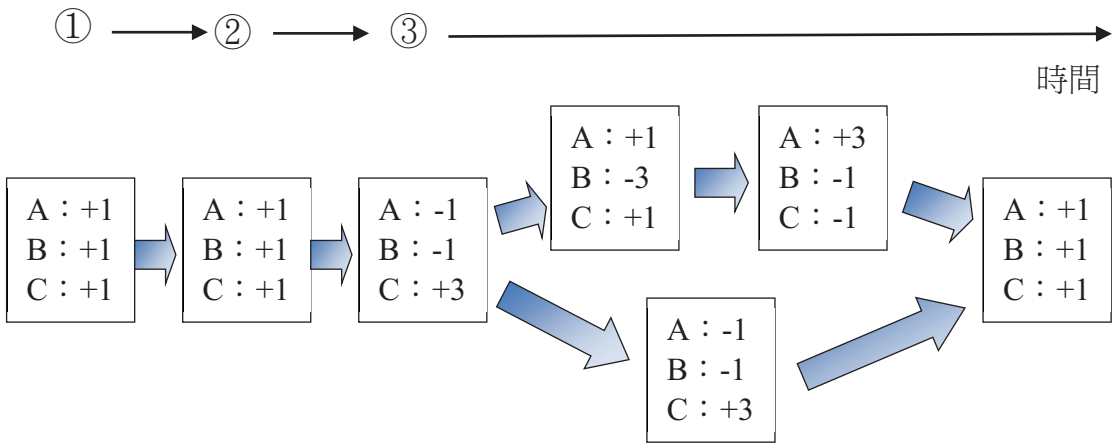


圖 4-3　權力轉移下之戰略三角變化之各方角色得分

資料來源：作者參戰略三角理論（包宗和，1999）繪製。

從戰略三角總體論角度而言，三邊家族型三角為最穩定的三角關係，因為總體論檢視各類型三角的整體利得，以三方角色得分加總為戰略三角的整體利益，其次穩定者為羅曼蒂克型、結婚型，單位否決型為總體論中整體利得最少、穩定度最差的三角關係（包宗和，2009:337-345）。

而從戰略三角個體論角度而言，任一方居結婚型三角的孤雛地位者，若要提升角色地位得分，所產生戰略三角類型變化如下圖，孤雛地位者將設法與另兩方的其中一方恢復友好，再與第三方恢復關係，如要提升角色到樞紐位置，可等待另兩方關係生變（包宗和，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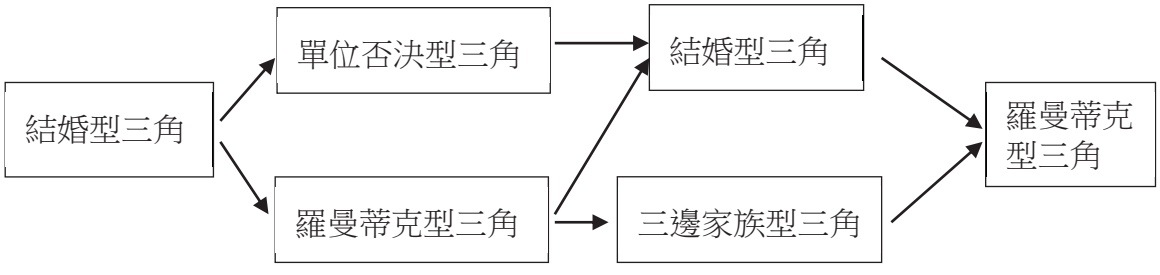


圖 4-4　孤雛地位者提升角色走向及三角類型變化

資料來源：包宗和（1999：342-347）。

在權力轉移理論下的戰略三角變化走勢，雖然最初從三邊家族型三角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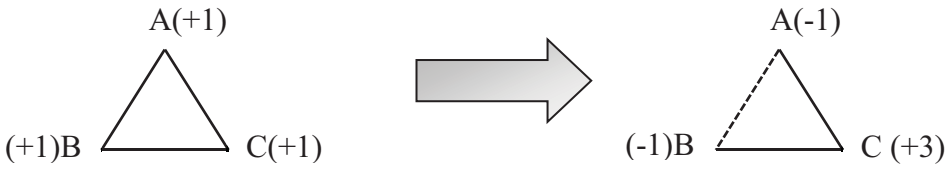
最終回到三邊家族型三角，符合戰略三角總體論最穩定的三角類型；但最初的三邊家族型三角卻未維持著總體論所謂的最穩定狀態，反而解體為羅曼蒂克型三角，甚至進入結婚型三角，看似有悖戰略三角總體論與個體論，惟可隱約看出在權力轉移理論下的戰略三角變化走勢，實仍依循戰略三角總體論與個體論的角色地位提升變化路徑，並賦予戰略三角理論更豐富的意涵。

一、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為羅曼蒂克型三角

在第③期間，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成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A 與 B 的戰略三角地位得分均由正 1 下降為負 1 ，A 此時的政策，無形中成就了 C 成為樞紐的最有利地位。故，在第③期間，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成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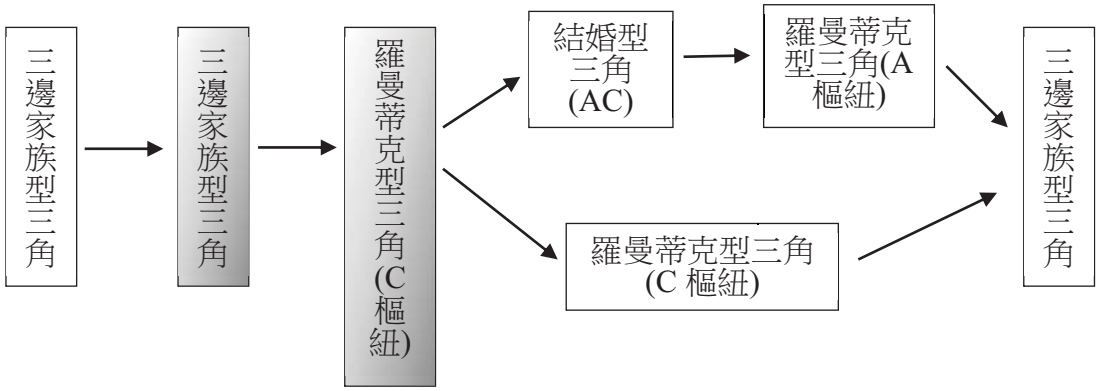
起因係 B 的國力高漲且不滿意現行體系內的資源分配規則，B 向 A 要求更多參與國際事務運作的支配與資源分享，A 感到國際霸主地位受威脅，擔心未來 B 的國力勝過自己，為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希望減緩 B 的國力增長速度，拖延 B 參與現行國際體系核心權力決策的時機。先以自己能影響的措施政策，減少對 B 工業化的幫助，AB 間的關係出現齟齬，A 使自己的角色得分降為負 1，同時也使對手國 B 在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得分下降，對 B 而言，此時係被動調整角色得分。

雖然 A 明知會使自己在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地位下降，看似不符合理性決策原則，但這是不得不的選擇，因為與其眼睜睜看著 B 的國力凌駕自己，卻一點防衛措施都不採行，恐將引發國內及體系內其他核心強權國的不滿，質疑其領導威信（Organski,1958），倒不如先發制人，阻撓對手發展，以冀望保住現行國際規則中核心強權國的共同利益，實屬正常防衛心理，當然，A 是共同利益的最主要受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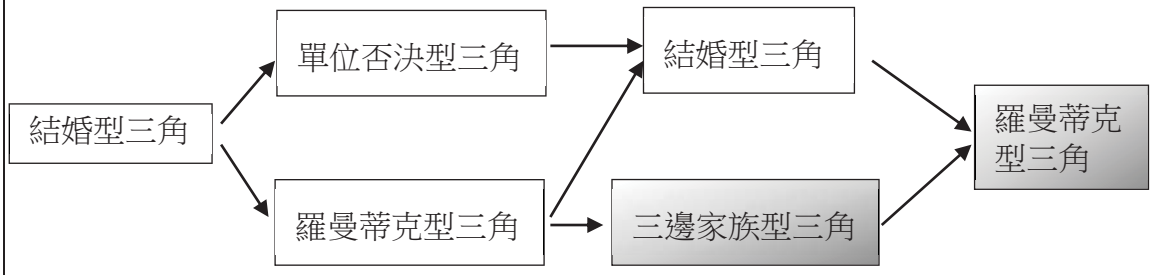


此戰略三角的改變，若從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之三角類型變化觀察，從三邊家族型三角成為羅曼蒂克型三角，係因 AB 關係變趨負面，而不論是 C 去破壞或 A、B 其中一方主動肇致，從下方的對照圖可知，三邊家族型三角不會直接跳到結婚型或單位否決型，而是逐漸變成羅曼蒂克型三角，顯示納入國力差異的權力轉移理論，更具體的詮釋戰略三角此種路徑演變的成因。

權力轉移期間，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成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



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之三角類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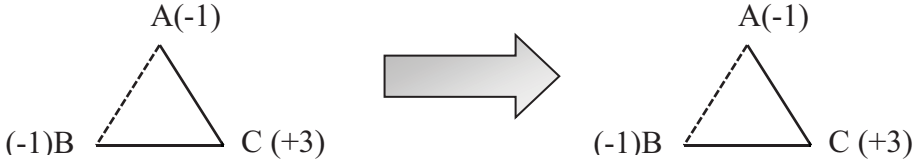
二、羅曼蒂克型三角維持或演變為結婚型三角

時間繼續前進，戰略三角地位得分降為負 1 的 A，若想提升自己在戰略三角中的角色得分，必致力拉攏 C 共同對抗 B，使 BC 關係交惡；而 B 基於提升角色地位得分的動機，也將說服 C 與其聯合，以破壞 AC 關係。因此，在第③期間，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可能維持或演變為 AC 結婚型三角。

C 為一個工業化的小國，面對世界體系的霸權支配國，以及快速工業化而增長國力的大國挑戰國，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從 C 的國家利益而言，自 B 尚未工業化時的正 1，到 B 因工業化使國力迅速成長逼近 A 時的正 3，的確使角色地位提升，符合戰略三角理論。

但面對 A 無法自行有效壓制 B 的國力成長與不滿足程度，進而要求 C 共同對抗 B，或 B 試圖拉攏 C 以破壞 AC 間的關係，挑戰國拉攏不滿意現行國際權力分配現狀的國家，以對抗權力頂端的支配國集團，是權力轉移理論論述中的正常現象，當支配國與盟友的整體權力優勢大幅勝過挑戰國集團時，世界較有可能維持和平（Organski,1958:328-332）。C 有自由選擇政策的能力，若 C 基於戰略三角地位得分最大化，而不理會 A 的請求，也不被 B 離間 AC 關係，或說 C 尚且滿意國際秩序運作現況，至少程度上並未不滿意到想與挑戰國 B 聯合以改變現狀，從而均未與 A 或 B 交惡，則戰略三角仍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C 的角色得分最高，此種戰略選擇對 C 的戰略三角角色得分最有利。

盟友不配合領導國共同對抗的情況亦非史無前例，美國自 2003 年向伊拉克發動的戰爭，在歐洲的盟友德國，基於己國利益考量就未出兵作戰；亦有出兵後提早撤軍者，例如丹麥。



換個情形，若 C 在第③期間接受 A 的請求，與 A 共同對抗 B，成為 AC 結婚

型三角，將使自己的戰略三角地位得分從正 3 下降為正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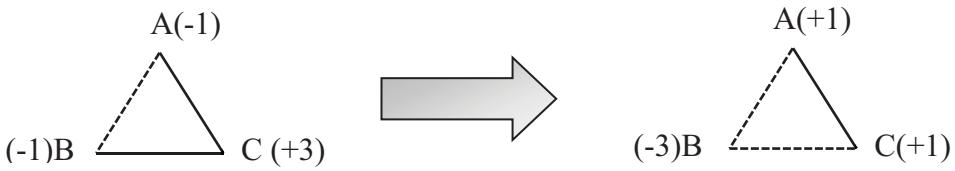
從戰略三角理論的理性決策原則觀之，此時 C 的決策選擇並不符合理性決策原則，似有違戰略三角理論的角色地位提升走向；但是當戰略三角理論加入了權力與國家目標等國際關係因素，三角中互有戰略關係的三方，已非單純追求角色地位得分的提升。

國際權力的分配，視一國與其盟友的權力優勢而定（Organski,1958:325），國力最強大的支配國與國力強大並滿意現行秩序的大國形成盟友關係（alliance），共同維持體系運作，以分享利益並達成國家的目標，例如美國與英國、法國的關係。而權力金字塔中下階層的中小型國家，如屬滿意現狀者，願意支持體系建立者的政策，接受現行國際秩序規則，以確保己國的既得或可預期利益，例如加拿大、比利時（Organski,1958:327-330）。權力轉移理論的支配國雖看似只有一個國家，但有許多滿意現狀的國家與其成為盟友，接受並遵守該支配國建制的國際秩序，大國更可能成為支配國依賴共同維護秩序的對象。

就國際權力體系以及國家的長短期目標而言，若 C 已長久在 A 建制維持的秩序內生存，累積獲得某種程度的國家利益，與國際秩序內的成員國具有一定程度的互信，雖屬小國，仍在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持續成長，國家目標得以達成。若撇棄過往既得利益及 AC 關係的互信，單獨僅考慮 BC 交流的獲益，在 A 面臨保衛領導地位的危急之秋，斷然拒絕 A 的請求，在 B 的未來國力能否勝過 A 的情勢混沌不明時，顯有輕看 A 支配國際體系的能力，實亦難謂符合明智之決策。故 A 雖無法掌控 C 的決策，但藉由國際權力階層體系的潛在約束原則，C 仍有可能與 A 共同反制 B，符合權力轉移理論認為，若挑戰國成功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權力的轉移，將是集團性的改變（Organski,1958:300）。[7]歐盟配合美國自 1989 年以來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措施，雖於 2005 年時曾研議解除，但在美國

[7] 原文係：”if ever one of these challenges is successful, it will mean a huge transference of po wer from one group of nations to another-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的遊說之下仍作罷[8]，卻也著實對歐盟國家的軍火重工業產值造成衝擊，歐盟承受著經濟不景氣的壓力與日俱增，支持體系領導國，需要付上不小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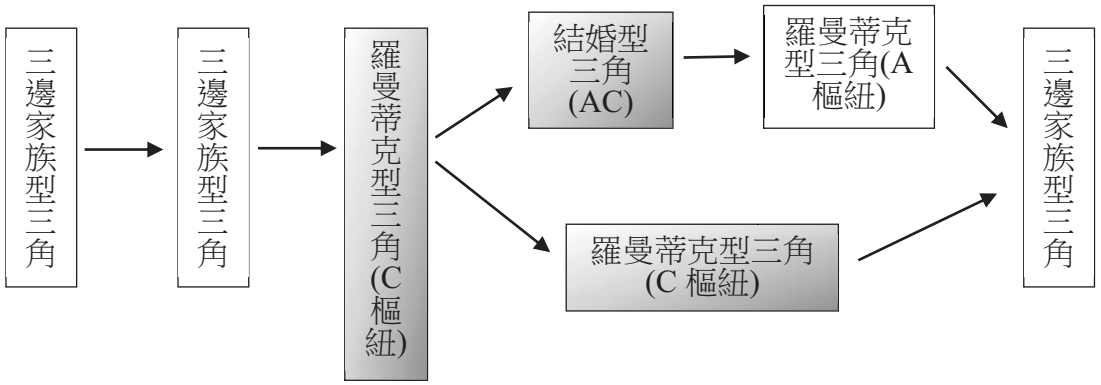
除了從國際權力階層同盟關係解釋，亦可從另一角度觀察，C 既然鑲嵌於 A 建立的國際秩序中，雖然 B 崛起成為挑戰國，以 A 為領導者的國際體系尚無瓦解傾向，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與其支持 B 建立一個不可預期的新體系，不如維持現有體系運作，對 C 較有穩定可預期的利益，因此，C 也可能與 A 共同反制 B 的成長，卻不易與 B 聯合反制 A，故不會出現 BC 結婚型三角。

基於誠信原則及實存利益的考量，因此 C 選擇與 A 站在同一陣線抗衡 B，為綜合權衡之後的選擇，雖然使自己的角色得分下降為正 1，但前一期的正 3 也不是自己決定的，是 A 的行為導致；而 C 與 A 聯合的結果，卻可以使 B 的角色得分暫時落入戰略三角中，最差的負 3 孤雛地位，同時 A 的角色得分從負 1 升為正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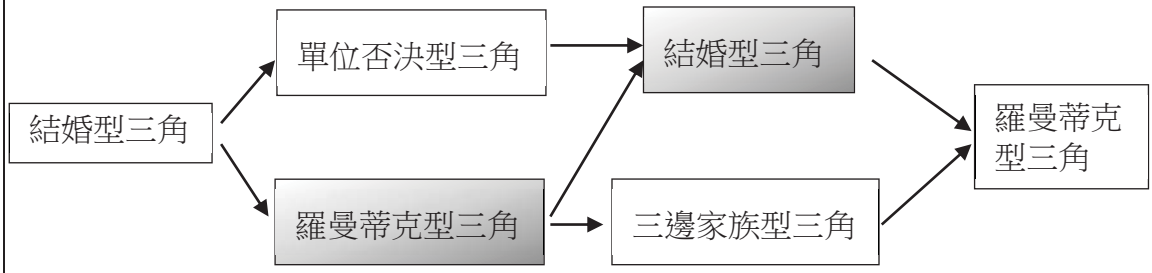
此戰略三角的改變，若從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之三角類型變化觀察，從羅曼蒂克型三角走向結婚型三角，係因 BC 關係變趨負面，尚符合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

[8] 自由電子報網頁，2005，〈歐盟將對中解除武禁 布希憂心〉，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feb/23/today-int2.htm，2005/2/23。

權力轉移期間，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成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



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之三角類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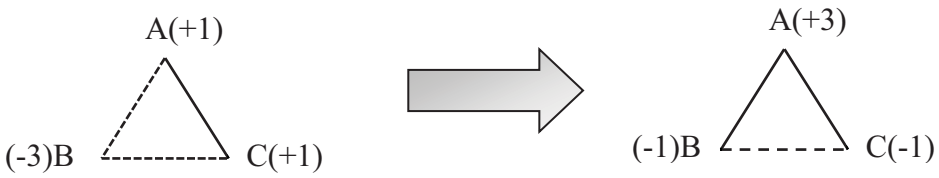
三、結婚型三角調整為以支配國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

當 C 在第③期間接受 A 的請求，與 A 共同對抗 B，成為 AC 結婚型三角，B 落入孤雛地位，然而，B 有提升戰略三角角色得分的動機，尋求與 A 或 C 恢復友好關係。在第③期間，AC 結婚型三角最可能調整為以 A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

對 B 而言，既然前一期間 C 選擇站在 A 的陣線對抗 B，當 B 的國力日益強盛，B 可能暫時擱置與 C 的關係，優先處理與 A 爭奪國際事務主導權，以獲取更多國際權勢。實力強大的 B，毋須公開與 A 交惡，即可憑自己能力協調國際事務或區域事務，分配弱小或中等國家權力利益，使 A 無法在 B 所掌控的領域，運用能力改變 B 的協調。此時，A 也有和平調整角色的動機，尋求與 B 和好，避免戰

爭或敵對可能削弱 A 的國力，因此 AB 關係修復，成為以 A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對 A 與 B 的戰略三角地位提升均有幫助，符合戰略三角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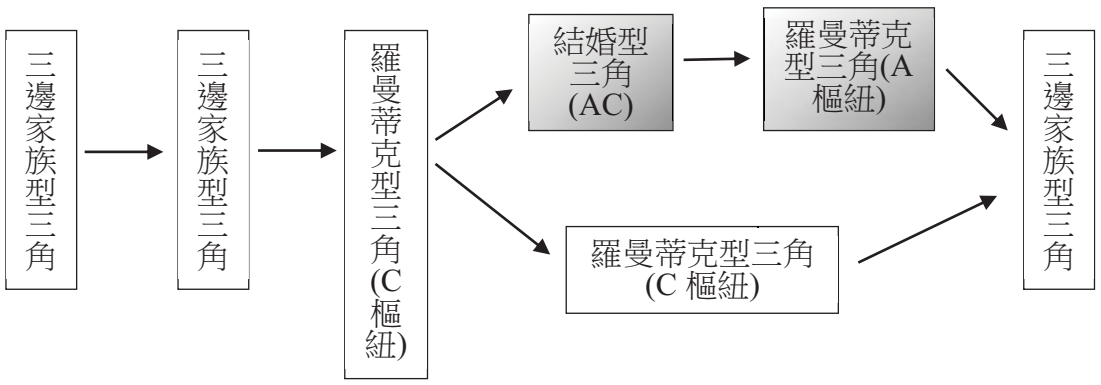
從美國於 2010 年春天與中國「悄悄修補關係」[9]看來，美國正視兩個體制迥異的大國，在國家利益的衝突上，仍需加以磨合，以維持關係正常運行，避免產生雙方均不樂見的負面效應。



當 AB 關係修復，C 的角色地位得分被動下降為負 1，將有修復 BC 關係的動機，以提高在戰略三角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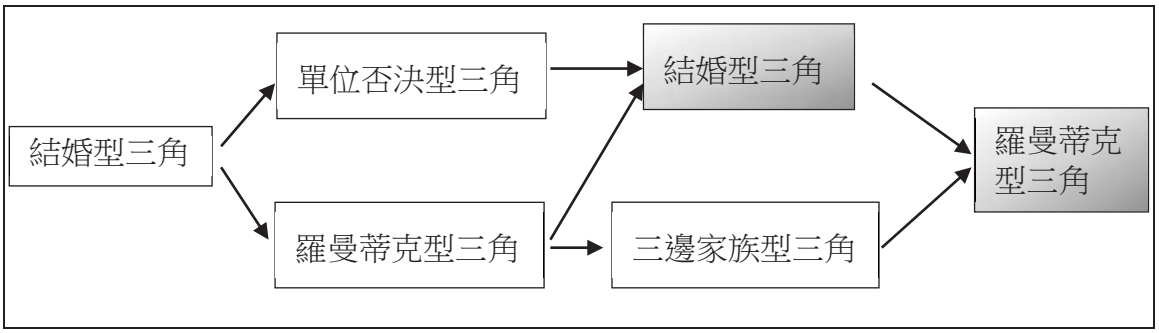
此種戰略三角的改變，若從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之三角類型變化觀察，從 AC 結婚型三角走向以 A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係因 A 願意與 B 修復關係，除了鑑於 B 已過於強大，相形之下自己顯得衰退，且與 B 和好可提升自己的戰略角色得分，符合戰略三角理論角色地位提升的路徑。

權力轉移期間，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成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



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之三角類型變化：

[9] 新浪網網頁，2010，〈美中正在悄悄修補關係裂縫〉，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int/chinapress/20100401/02021311466.html，2010/0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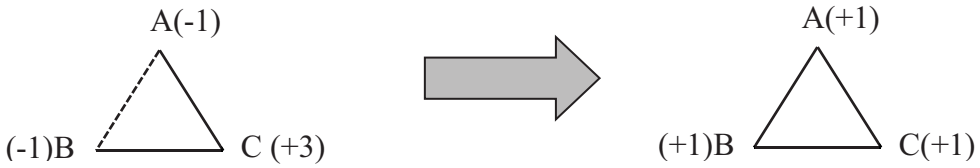


四、最終均回歸至三邊家族型三角

當戰略三角關係成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亦即 C 基於自身國家利益極大化而不與 A 聯合對抗 B，或不與 B 聯合而損失自己在 A 所領導國際體系中的利益，A 與 B 均有提升戰略三角地位得分的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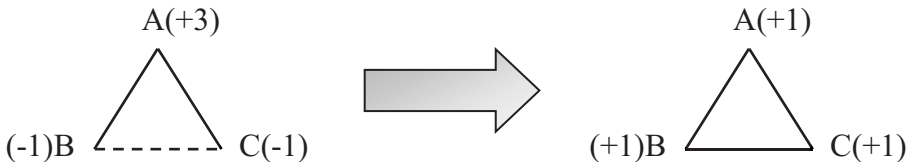
A 眼見 B 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日形擴大，在諸多區域或事務領域的排解糾紛或協調利益，都能使其他國家接受其建議，其他國家也知道 A 所維持的國際秩序體系，受益最大的仍是 A，中強或弱小國若能從 B 獲得利益，也屬有利；A 明白愈來愈多國家接受 B 對國際事務運作的安排，A 就愈不可能藉由戰爭等手段來攻擊別國眼中的好人，因此，A 將試著與 B 和好，和平調整國際地位，期望在 B 未來國力勝過自己而取代自己成為國際體系領導者時，自己能保有一個具尊嚴的國際地位（Organski,1958）。當 A 願意與 B 保持友好關係，B 基於角色提升的動機，也樂於恢復關係，此時的戰略三角回到三邊家族型三角，A 與 B 的角色地位都從負 1 提升到正 1。

C 的角色得分雖從正 3 下降為正 1，但下降原因並非自己可決定，乃另兩國關係修復所導致，故尚符合理性決策追求國家利益極大或損失最小的原則，此種三角乃戰略三角總體論認為最穩定的三角型態，亦是戰略三角個體論追求的動態平衡（包宗和，2009）。



至於若戰略三角係從 AC 結婚型，走向以 A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B 與 C 的戰略三角地位得分均為負 1，有提升地位的動機，亦即尋求 BC 友好關係的建立或恢復。

當 C 見國際權力的支配國 A 都與崛起的挑戰國維持友善關係不再敵對，自己身為體系內的小國，與大國友好，是追求國家利益的基本原則，因此，C 也會與 B 修復關係。B 身為挑戰國，與中小國家友好以促進其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對自己有利，故 B 亦將與 C 建立友善關係。是故，戰略三角回到三邊家族型三角，B 與 C 的角色地位都從負 1 提升到正 1，符合戰略三角各方追求自己利益的動態平衡。



中國大陸積極拉攏美國盟友，2003 年起與歐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10]，「2004 年中歐雙邊貿易提前兩年超過 1,500 億美元，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和第四大外資來源地，也是中國最大的技術引進來源地。」[11]，並支持歐洲挺過歐債危機，副總理李克強更於 2012 年 5 月投書金融時報表示「中國對歐洲充滿期待」，希望加強中歐關係。而英國首相卡麥隆於 2013 年 12 月率團訪問中國大陸，以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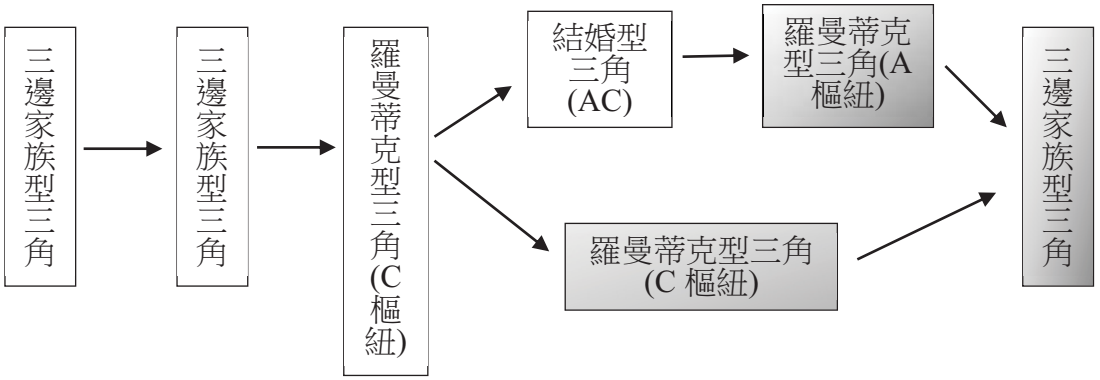
[10]新華網網頁，〈新華資料－歐洲聯盟〉，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2/19/content_664530_5.htm，2014/01/28。

[11] 新華網網頁，2005，〈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和第四大外資來源地〉，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1/06/content_2424728.htm，2005/0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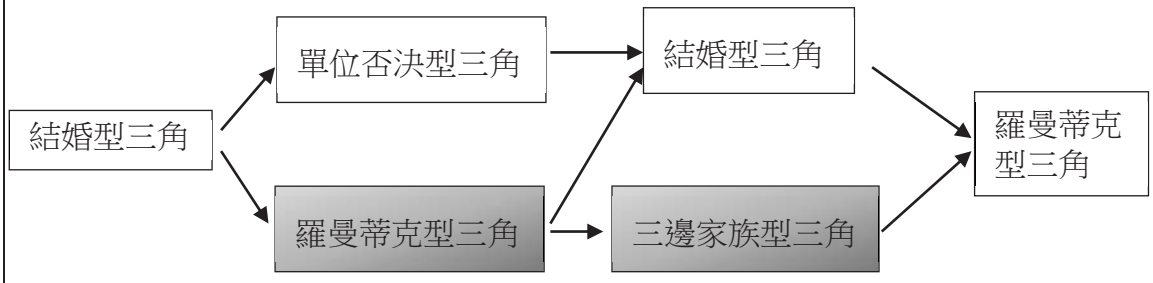
破 2012 年接見達賴喇嘛惹惱中國大陸所造成的關係僵局。[12]歷史顯示，基於己國利益的考量，挑戰國存有拉攏一個看似屬於權力支配國盟友的動機，而支配國盟友最後也將尋求與挑戰國建立友好關係。

此戰略三角的改變，若從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之三角類型變化觀察，從以 A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走向三邊家族型三角，係因 C 與 B 修復關係，兩方的戰略角色得分均上升，且從總體戰略三角而言，三邊家族型三角是整體利得最大、最穩定、衝突最低的三角類型，故其走向符合戰略三角理論。

權力轉移期間，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成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



戰略三角個體論提升角色地位走向之三角類型變化：



五、小結

戰略三角理論認為三方角色地位提升的動態平衡，係從結婚型三角到羅曼蒂

12 中時電子報網頁，2013，〈英相訪中 修復夥伴關係〉，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6/112013120300181.html，2013/12/03。

克型三角，再朝向三邊家族型三角，成為最穩定的三角型態（包宗和，2012: 355-356）。從前述分析，國際體系中的戰略三方，因著工業化提升國家權力過程中的互動關係，即使從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為以 C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之後可能歷經 AC 結婚型三角（B 孤雛），並朝向以 A 為樞紐的羅曼蒂克型三角變動，但最終都將回歸到三邊家族型三角。不論小國 C 是否與支配國 A 合作，縱然三方角色得分暫時下降，但可視為係追求自己國家長遠利益的臨時作為，戰略三角類型仍在戰略三角個體論所述提升角色地位走勢的路徑中，只是切入時間點不同。此種走勢，並未違悖戰略三角理論所述角色地位提升的動態均衡，與戰略三角整體利得極大，反而因為權力轉移理論，為戰略三角理論呈現另一番風貌。

參、研究限制

本文面臨的研究限制主要有幾方面，首先，不排除權力轉移理論與戰略三角論本身在解釋國際關係的侷限性，探討國際關係的理論各從其類，無絕對地是非對錯或優劣，端視各派學者切入解釋的角度，故必定無法面面俱到，本研究選擇戰略三角理論與權力轉移理論的相關探討的資料時，儘量以客觀的學術文章為主。

其次，權力轉移理論著重於工業化帶來國家實力的上升，本研究承襲 Organski 最初建構理論之概念，故不具體衡量戰略三角三方行為者國力大小，而以國際社會普遍認知，三個行為者的國力具有明顯程度差異等級。雖然學者研究國家權力係由國家實力決定，而且分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及定性和定量結合分析三種學派以分析國家力量（倪世雄，2010:231-232），但國家所擁有的總體能力很難比較，每種能力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亦不相同（胡祖慶譯，1997:168-171）。

鑑於權力轉移理論焦點集中於支配國與挑戰國對待彼此的心態及權力的消長，故本研究直接假設戰略三角中的兩方為支配國與挑戰國，至於第三個行為體，則設定為已工業化且滿意現狀的相對小國，理由係因落後貧窮的小國，較難撐起

戰略三角的第三角，它不太容易具有兩大強權重視的戰略價值，若它又不滿意權力分配現狀，則在國際秩序中充滿不確定性，極易因為威脅利誘而倒向某一權力陣營，失去政策自主性，恐將使戰略三角失去第三角，又成為支配國與挑戰國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面。

第三，國際關係的友善或敵對關係，難以客觀界定，隨著時間經過，持續動態調整變化，且改變的速度難以預測。為集中探討三個行為體在權力轉移理論之下的關係變化走勢，如何反饋於戰略三角理論，故政策影響彼此關係友善或敵對之界定，不列入本研究之範圍。

第五節　章節安排與研究架構

壹、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章節安排順序，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並對權力轉移理論以及戰略三角理論做相關文獻回顧，並介紹權力轉移理論與戰略三角理論的主要論述。第二章開始推導建構權力成長與轉移下的戰略三角可能模式走向。第三章，將上一章推導出的走向與戰略三角理論所提動態均衡做差異分析。第四章為結論，歸結研究發現，並陳述研究限制。最後，附上中文及外文參考文獻。詳細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範圍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架構

第二章　權力轉移期間之戰略三角可能類型變化

　第一節　挑戰國尚未工業化

　第二節　挑戰國開始迅速工業化，國力發展迅速

　第三節　挑戰國國力高漲，不滿足於現有國際體系的地位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權力轉移理論下戰略三角類型變化走勢與戰略三角理論之分析

　第一節　三邊家族型三角解體為羅曼蒂克型三角

　第二節　羅曼蒂克型三角維持或演變為結婚型三角

　第三節　結婚型三角調整為羅曼蒂克型三角

　第四節　最終均回歸至三邊家族型三角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研究限制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貳、外文部分

貳、研究架構

戰略三角論認為三方互動可能有四種三角類型，分別為結婚型、羅曼蒂克型、三邊家族型與單位否決型；惟戰略三角論並未探討三方行為者於不同國力階段，互動可能產生的類型變化，本研究將從 Organski 提出之權力轉移理論，分析完全工業化進入權力成熟期，建立國際秩序的支配國 A，面對進入權力成長期而快速工業化的 B，以及已工業化的天生小國 C，三者互動的心態及可能的關係良窳，導致戰略三角的可能變化，研究架構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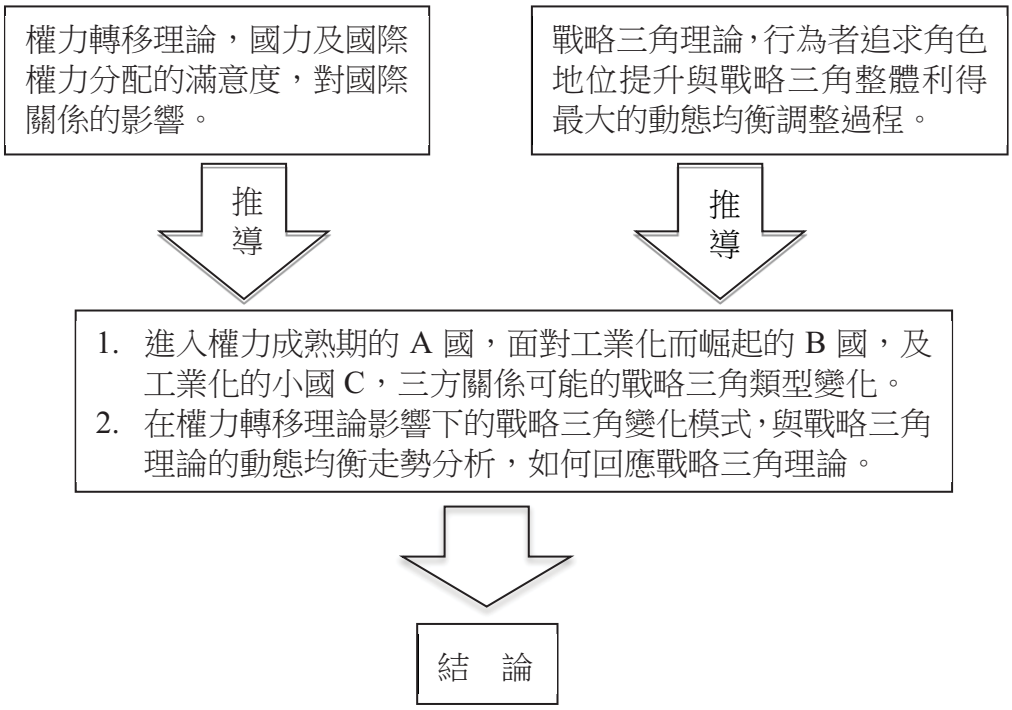


圖 5-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六節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丁永康，1999，〈冷戰後美國的大戰略〉，《美歐季刊》，13 (2): 161-180。

丁渝洲主編，包宗和等著，2004，〈綜合報告〉，《臺灣安全戰略評估 2003-2004》，P6，臺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丁蕾、劉軍，2005，〈美國的霸權穩定與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中共濟南市委黨校學報》，2005(1): 105-107。

王建偉，2013，〈點評中國：大國外交—習近平揚棄「韜光養晦」〉，BBC 中文網網頁，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focus_on_china/2013/12/131202_cr_xijinping_diplomacy.shtml，2013/12/02。

王堯鈞，2005，《進出戰略三角: 認同台灣的國際政治學》，臺北：翰蘆。

王雲東，2012，《社會研究方法 ： 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新北市：威仕曼文化。

包宗和，1997，〈二十一世紀我國的外交策略〉，《國家政策雙周刊》，161：2-3。

包宗和，1999，〈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台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頁 337-364。

包宗和，2000，《後冷戰時期國家發展的見證與評析》，臺北：翰蘆。

包宗和，2009，〈戰略三角個體論檢視與總體論建構及其對現實主義的衝擊〉，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頁 335-354。

包宗和，2011，《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石之瑜，2000，〈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問題與研究》，39(7)：37-53。

朱柔若譯，2000，《社會研究方法 ： 質化與量化取向》，臺北：揚智文化。譯自 Neuman, W. Lawrenc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USA: Allyn & Bacon. 1997.

朱雲漢、黃旻華，2007，〈探索中國崛起的理論意涵－批判既有國關理論的看法〉，朱雲漢、賈慶國主編，《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臺北：五南，頁 23-58。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書局。

吳玉山，2000，〈非自願的樞紐－美國在華盛頓－台北－北京之間的地位〉，《政治科學論叢》，12：189-222。

吳玉山，2002，〈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九一一與布希主義〉，《政治科學論叢》，17：1-32。

吳定，2003，《公共政策辭典》，臺北：五南。

吳釗燮，2010，〈主導性霸權的困境－九一一後國際局勢與美中台關係演變〉，《東吳政治學報》，28(1)：1-32。

宋學文，2004，〈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43(2)：171-196。

宋學文，2011，〈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影響：一個「霸權穩定論」演化的分析觀點〉，《東吳政治學報》，29(3)：1-51。

宋學文、黃子哲，2009，〈從東帝汶獨立運動探討美國的干預主義〉，《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理論、政策與治理》，臺北：巨流。

宋興洲，1997，〈國際合作理論與亞太區域經濟〉，《問題與研究》，36(3): 27-59。

宋蕙吟，2003，《理性選擇理論與國際安全研究》，臺北：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論文。

李美華等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臺北：時英出版社。譯自 Babbie Earl.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th ed.*.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周煦著，1999，《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臺北：生智。

明居正，2009，〈國際體系層次理論與兩岸關係：檢視與回顧〉，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明居正，2011，〈國際體系理論與兩岸關係〉，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林永芳，2010，〈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中、美因素的影響〉，《國家發展研究》，9(2)：81-121。

林呈曦，2005，《戰略三角下中間行為者之策略選擇－日本與美中蘇戰略三角之互動，1971-1991》，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宗達，2010，〈權力與國際體系〉，明居正主編，《國際關係綜論》，臺北：晶典文化，頁 165-194。

施正鋒，2001，《台中美三角關係 ： 由新現實主義到建構主義》，臺北：前衛。

胡祖慶譯，1997，《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臺北：五南。譯自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Hill Inc.. 1979.

倪世雄，2010，《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2012，《一九四九年後的海峽風雲實錄 ： 美中台三邊互動關係大揭秘》，臺北：黎明文化。

唐開太，2007，《冷戰後美國的台海嚇阻戰略》，臺北：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涂志堅、唐欣偉，2001b，〈從整體觀點看柯林頓政府時期的美中臺戰略三角〉，《遠景季刊》，2(2)：163-195。

秦亞青，2008，《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馬準威，2007，《東亞國際體系的權力轉移與兩岸關係》，臺北：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盛治仁，2003，〈理性抉擇理論在政治學運用之探討〉，《東吳政治學報》，17：21-51。

陳文俊譯，2007，《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臺北：新加坡湯姆生亞洲私人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譯自 Babbie Earl.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0th ed*. Thomas. 2004.

陳欣之，2010，〈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成起伏〉，《問題與研究》，47(1)：59-85。

陳欣之，2011a，〈崛起、挑戰與承繼 霸權 ：崛起強權參與建構國際制度過程的觀察〉，《問題與研究》，50(4)：63-88。

陳欣之，2011b，〈霸權與崛起強權的互動－美國對中國暨印度的策略〉，《遠景基金會季刊》，12(1)：1-41。

陳義彥等譯，2007，〈理性選擇研究途徑〉，《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臺北：韋伯，頁 75-105。譯自 Hugh Ward.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陳義彥等譯，2007，《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臺北：韋伯。譯自 David Marsh and Paul Furlong.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傅澤民，2009，《權力不對等之互動結構與小國面對強鄰的策略選擇：古巴、斯里蘭卡和台灣》，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復生，2011，〈和戰兩手 美國應對亞太新局策略〉，《國政分析》，臺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址: http://www.npf.org.tw/post/3/9962，國安(析)100-082 號。

楊宇光等譯，1994，《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桂冠。譯自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楊懿如，2007，《柯林頓政府的兩岸政策：從霸權穩定理論角度分析》，臺北：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溫洽溢譯，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臺北：遠流。譯自 Shirk L.

Susan.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廖小娟，2006，《小國提升國際地位的策略－兼論對臺灣的啟示》，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維基百科，2014，〈各國國內生產總值列表 (國際匯率)〉，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E5%88%97%E8%A1%A8_(%E5%9B%BD%E9%99%85%E6%B1%87%E7%8E%87)，2014/01/25。

蔡明彥，2006，〈東亞安全秩序建構：霸權穩定、權力平衡與多邊機制的思辯〉，《全球政治評論》，14：1-17。

蔡東杰，2008，〈後冷戰時期美國東工政策及其戰略局〉，《東亞研究》，39(2)：176-198。

鄭端耀，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2(2)：1-21。

簡守邦譯，2002，《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臺北：韋伯。譯自 Derek Layder. *Sociological Practice*. Sage Publishing. 1998.

羅致政，1995，〈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10(1)：37-54。

羅惠君，2011，《美中競逐下的國際危機與權力轉移理論：權力資源 vs.影響力》，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譚偉恩，2006，〈權力平衡理論之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22：129-165。

貳、外文部分

Arbetman, Marina and Jacek Kugler edited. 1997. *Political Capac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 America: Westview Press.

Campbell, K. M. and Mitchell D. J. 2001.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Foreign Affairs* 80(4) : 14-25.

Dittmer, Lowell. 1981.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 485-515.

Dittmer, Lowell. 1987.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Ilpyong J. Kim 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Dittmer, Lowell. 2005. “Bush, China, Taiwan: A Triangular Analysi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0(2): 21-42.

Elster, J.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nguly, Sumit. 2010. “Can India be Great?" in http://apac2020.thediplomat.com/feature/can-india-be-great/. Latest update 25 January 2014.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siung, James C. 2004. “The Strategic Triangle Dynamics Between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6(1):14-17.

Kan, S. A. 2007.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 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Keohane, Robert.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berger, Charles.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indleberger, Charles.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2): 242-254.

Kugler, Jacek and Douglas Lemke edited. 1996.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nzner, Carl. 2007.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U.S.." *The Ripon Forum* 41(2): 20-21.

Modelski, George and William R. Thompson. 1989.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Edited by Manus I. Midlarsky. USA: Unwin Hyman, Inc. 23-54.

Morgenthau, Hans J. 1956.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Organski, A.F.K. 195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Organski, A.F.K. 1965.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Organski, A.F.K. and Jacek Kugler. 1977. "The Costs of Major Wars: The Phoenix Fact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4): 1347-1366.

Organski, A.F.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ganski, A.F.K. and Jacek Kugler. 2008. “The End of Hegemon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2): 113-128.

Pant, Harsh V. 2004. “The Moscow–Beijing–Delhi ‘Strategic Triangle’: An Idea Whose Time May Never Come.” *Security Dialogue* 35(3):311-328.

Powell, Robert. 1996. “Uncertainty, Shifting Power, and Appease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4): 749-764.

Shambaugh, David. 2001. “Facing Reality in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80(1) : 50-64.

Shambaugh, David. 2005. “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 U.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8(3).

Snidal, Duncan. 1985.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4): 579-614.

Tammen Ronald L….[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3.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0. “The future of the world-economy.” *Processes of the world syst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67-180.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4. “The 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46.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ichigan: Addison-Wesley Pub. Co.

Wu, YS. 1996. “Exploring Dual Triangl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pei-Washington-Beijing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32(10): 26-52.

Wu, YS. 2005. "From Romantic Triangle to Marriage? Washington-Beijing-Taipei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Comparison." *Issues & Studies* 41(1) : 113-159.

Wu, YS. 2006. "Domestic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riangular Interaction Among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The U.S. China Policy." *Issues & Studies* 42(1): 3.

Zhao, Quansheng. 2001. "China and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9): 663-681.